臺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
2012 年 6 月，頁 1-64

BIBLID1012-8514(2012)49p.1-64
2012.1.16 收稿，2012.6.25 通過刊登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
——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

楊　典　錕*

提　要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不論在近代中國軍事、政治史，或是近代中日交流、外交史等研究上，皆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培養近代中國軍事人才的四大機制中，最早確立的即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生制度。清末各省講武堂等軍事學校、民初成立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國共合作產物——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者聘任的師資，或多或少都仰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生。留日士官生漸次投入近代中國軍事教育最前線，這對近代中國軍事教育的永續經營，以及國家生存發展之獨立自主等方面，均有頗大貢獻。

中國武備留學生在經過成城學校或振武學校的預備軍事教育，再接受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正式軍事教育薰陶後，學成歸國，他們為中國的軍事近代化帶來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包括參謀制度到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建立，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及對各級軍事學校的經營各方面。此外，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對留日士官生的拉攏與重用，除為這些勢力的當權者帶來一定的政治利益或軍事效益外，也反映了留日士官生各自的政治傾向。

關鍵詞：清末民初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中國武備留學生　中國的軍事近代化
南方革命勢力　北洋保守勢力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E-mail: tkya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中國武備學生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三、留日士官生參與中國軍事近代化
四、留日士官生與清末民初南北政治勢力
五、結語

一、前言

東亞文化圈內，中國之於日本，自漢、唐以降大多處於「文化輸出者」地位。中日甲午之戰的結果，顯示日本在學習西法改革以資救亡圖存的實際成效優於中國。因此，甲午戰後中國鑒於鄰邦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改革已初見成效，除直接聘請日人前來協助各方面建設外，亦開始派遣留學生赴日本留學。此一過去的文化輸入者（日本）對文化輸出者（中國）的回饋，形成一股「文化回流」現象，在中日交通以來的文化交流史上，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軍事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若能認識它的全貌，就得以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關鍵。[1]中國自甲午戰爭以後開始以日為師，從殖產興業到富國強兵等無所不學，近代中國的軍事建設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響。筆者前已針對甲午戰後到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派駐在中國的軍事教官、軍事顧問及特務機關等，做了一系列考證分析，並取得初步成果。[2]本文則擬在既有研究基礎之上，參酌各項先行研究成果，並運用相關史料，聚焦於清末民初遠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中國留學

1 吳相湘，〈評包維理著《中國新軍之興起》〉，收入氏著，《近代史事論叢》（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第一冊，頁 37。

2 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1898-1945）〉（東京：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日本文化研究專攻日本史學專門領域博士論文，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3]俾利對彼等在中國近代政治、軍事史及近代中日外交、交流史上的存在意義進行分析。

近代中國派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以下或簡稱「陸士」）的留學生之相關研究，散見於零星記載中，但由於制度最初實行時間距今已百年以上，許多基本史實都有不少訛誤。文末之附表一到附表三，係筆者整理三位學者關於中國武備留學生在陸士之入學、畢業時間及畢業人數等資料，將之列表比較的結果。吾人可發現，不只入學或畢業時間有出入，就連最基本的各期畢業人數也是眾說紛紜。之所以會有上述問題，筆者認為最大原因在於基礎史料亡佚。陸士之預備學校為成城學校，其後改為振武學校。振武學校自明治三十六年（1903）開辦，至大正三年（1914）停辦，這十二年間所培育之中國留學生資料毀於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振武學校的學生畢業（或退學）名簿既已散佚，[4]而陸士畢業生人數統計又以日本本國學生為主，故振武學校畢業後進入該校之中國留學生畢業人數，則難有資料。

為解決上述難題，筆者嘗試運用一份珍貴史料——〈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5]這份史料收錄於東亞同文會於大正九年（1920）十月二十五日所發行的《支那年鑑》第四號上，原件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約作成於關東大地震發生三年前，當時振武學校的學生資料都還在，故筆者相信該表是研究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的關鍵史料。美中不足的是，日本陸士中國留學生班總共三十一期，該表只記載第一到第十一期。可以確定的是，前十一期的統計數字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故本文擬探討到第十一期為止。筆者依據該表，將行文中提到之畢業生姓名及統計資料所得製成附表四。附表四的可信度較高，後述將以附表四為主，以附表一到附

3 日文的士官即中文的軍官之意。

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131。

5 〔日〕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第四回（東京：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1920），頁 706-7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三為輔。

本文除前言和結語之外，共分三節。第一節探討中國武備留學生前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學的時代背景，分析中國和日本雙方各自的盤算，並論述中國武備留學生在成城學校、振武學校以及陸士學習的概況，並視需要，分析日本的軍校制度。第二節從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引入、野戰演習的實施，以及對各級軍事學校的建立等三個方面切入，探討留日士官生對清末中國軍事近代化之主要貢獻。第三節則探討留日士官生和民初南北勢力間的關係，分別論述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對留日士官生的重用和拉攏，並分析這些勢力的當權者起用彼等的考量和目的。

二、中國武備學生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一）中國武備學生留日的背景和日本參謀本部的勸誘

甲午戰後，俄國因領銜發起三國干涉還遼，使中國朝野上下沉浸在一股聯俄制日的氛圍中。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 年 6 月 3 日），受邀赴俄京聖彼得堡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i II, 1868-1918）加冕典禮的李鴻章（1823-1901），[6]就在這股氛圍下，與俄國簽署了近代史上中國與外國間的第一個同盟條約——中俄同盟條約。[7]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國藉口山東鉅野教案占領膠州灣時，[8]俄國即佯稱欲助華抗德及履行同盟條約，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7 年 12 月 15 日）進占旅順、大連。[9]

俄國的謀華野心，不僅使當時中國各界萌起的聯俄美夢為之破滅，

6 〔日〕尾鍋輝彥，《帝国主義時代の開幕》（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 129。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 277。
8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58），頁 510。
9 〔日〕篠原昌人，《陸軍大将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頁 113-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亦激起了日本朝野上下之警戒心。日本各界人士目睹中國在歐洲列強交相侵凌的窘境下守土無方，亦興起兔死狐悲的危機意識。如成立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二日，揭櫫「東亞保全論」旨趣的日本民間團體「東亞同文會」，[10]其首任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便在翌月發表〈帝國的位置和現代的政治家〉，指出日本在面對鄰邦中國遭逢被分割危機時，所應具有的認識和態度。其文曰：

> 蓋今日帝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儘速制定國是，確定國論，從而使對支那的政策趨於一定，此乃當今最要緊至急之事。余今日所言，並不是說因為帝國和支那是同文同種的緣故，帝國就必須自然而然地進而承擔支那的命運。而是考察帝國將來的命運，實在是應當適應此形勢，並訂定確實的經綸，進而隨機應變，急施猛行，以制今日之時宜。[11]

由上可知，當時日本朝野固然關切中國危局引發之東亞緊迫局勢，但此危機意識，與其說源於東亞同文會所極力提倡之從同文同種觀點出發的「日清提攜論」，不如說是以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為考量出發點，以所謂「文化相通、風教相同」主張包裝的「國益優先論」。[12]此一思考邏輯在上述近衛的文章中，實已表露無遺。

近衛篤麿主張的國益優先論，和以頭山滿（1855-1944）為中心的「玄洋社」（1881 年成立），及內田良平（1874-1937）籌組的「黑龍會」

10 東亞同文會係由東亞會（成員為三宅雄次郎、犬養毅、內田良平、平山周、宮崎寅藏等），和同文會（成員有近衛篤麿、中西正樹、宗方小太郎、田鍋安之助、白岩龍平等）為獲得政府補助金而合併成立，總部設在東京。該會除標榜日清友好，亦注意中國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所發行的《東亞同文會報告》及其後更名續刊的《支那》，乃是研究清末民初中日關係的重要史料。參見〔日〕相原茂樹，〈近衛篤麿と支那保全論〉，收入〔日〕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頁 59。

11 〔日〕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亜同文会史》（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88），頁 182。

12 「文化相通、風教相同」數語，見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通過的東亞同文會〈主意書〉。參見〔日〕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會則〉，《東亞同文會報告》121 回（1909 年 12 月 26 日，東京），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1 年成立）等大陸浪人團體所奉為圭臬、充滿大亞細亞主義色彩的「東亞盟主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爾後在日本遂行的大陸政策中，國益優先論者和東亞盟主論者雙方分進合擊，在培養人才的事業和輿論宣傳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此具有共通性的兩者，入江昭以相對於「政府的現實主義」的「民間的理想主義」來統括命名之，確有其獨到之處。[13]

國益優先論不僅獲東亞同文會等在野勢力認同，日本政府要員亦抱持同樣看法。明治三十二年（1899）五月二十七日，首相山縣有朋（1838-1922）寫給兩位閣僚——藏相松方正義（1835-1924）和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之〈關於清國特使的意見書〉一函中，曾提出如下意見：

> 余觀清國的情勢，歐洲列強所到之處，便在清國的版圖內擴張其利益線，其勢終將使清國的地圖變成赤、黃、青等分色，此乃相當明瞭之事。清國就像猶太人種，可斷定將來必定是國滅而人種尚存之情況。我國亦當對此未來預作準備，採取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擴充利益線的舉措。[14]

綜觀山縣有朋的意見，可名之為「官方的國益優先論」，也可看出山縣與近衛篤麿思想一脈相承之處。早在上述信函作成的九年前，即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月，山縣有朋便曾在〈外交政略論〉一文中，將「國家獨立自衛之道」定位在「守禦主權線，不容他人的侵害」，以及「防護利益線，不失自己的形勝」此兩大要務中。[15]同年十二月六日，山縣有朋又在第一議會（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日本之所以要擁有強大的陸、海軍，係為守護日本列島的「主權線」，還

13 根據入江昭的研究，東亞同文會的「日清提攜論」和黑龍會的「東亞盟主論」，兩者的特徵皆具有非難日本政府的現實主義外交，以及抗拒歐美諸國外交政策所主導之國際政治的潮流等傾向。詳參〔日〕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 41-47。

14 〔日〕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頁 251-252。

15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頁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須守禦和國土防衛有關的朝鮮半島之「利益線」。[16]此即山縣有關主權線和利益線的著名演說。由此可知，甲午戰前日本的利益線指朝鮮半島，而甲午戰後日本目睹列強分割中國，本身亦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已將利益線進一步伸向中國大陸。

與山縣有朋意見相左的參謀本部，則基於黃、白人種對抗論而產生危機意識，[17]向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1830-1902）和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等清廷封疆大吏進行建立「中日聯盟」的遊說工作。此派可名之為「官方的人種同盟論」，主要代表人物為川上操六（1848-1899）。

川上操六、桂太郎（1848-1913）與兒玉源太郎（1852-1906）三人，是日本陸軍自明治十九年到二十二年（1886-1889）間所進行之軍制改革的中心人物，[18]被稱為明治陸軍之三羽烏（三傑），足見彼等在日本陸軍發展史上的重要性。甲午戰爭時，川上操六以參謀本部次長身分擔任大本營陸軍上席參謀兼兵站總監，[19]其人素有中日提攜、東亞保全的意識。[20]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川上操六派遣參謀本部第三部負責

16 〔日〕井上光貞、永原慶二、兒玉幸多、大久保利謙編，《明治憲法体制の展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上卷，頁 6。

17 此論調亦可見於近衛篤麿、山縣有朋等國益優先論者的言談中。由此可知當時日人對中國存在著夾雜「國益優先論」和「人種同盟論」此兩種主張的矛盾心理，才會出現兼具兩種想法的人物。如主張國益優先論的近衛，便曾站在人種同盟論的立場說道：「列國同盟，分割中國之時，即意味著黃、白兩人種的競爭已告結束。在此結局中之日本人的命運，欲獨善其身於人種競爭之外，豈可得乎？」參見〔日〕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4 卷 1 號（1898 年 1 月 1 日，東京），頁 2。

18 〔日〕藤原彰、今井清一、大江志乃夫、江草忠允編，《近代日本史の基礎知識》增補版（東京：有斐閣，1979），頁 126。

19 〔日〕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37：大本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7），資料解說，頁 27-28。

20 川上操六於公於私，皆對以中日為中心之東亞合作保全的提倡不遺餘力。如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川上捐出變賣自宅所得款項，充當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設基金。該書院成立於同年五月，係東亞同文會在上海成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延聘陸軍軍人根津一（1860-1927）擔任院長，學生主要是日本人，以促進中日合作、謀求東亞久安為其教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國事務、諜報關係部員宇都宮太郎（1861-1922）大尉到武昌，會見張之洞，表示今後中、日兩國為共同對抗白色人種，中國實有必要藉由日本援助加強軍事力量；[21]為達上述目的，當務之急便是請張聘用日本人做為軍事顧問，以及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22]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川上操六升任參謀總長。[23]二月，川上再命宇都宮太郎和神尾光臣（1855-1927）大佐拜訪張之洞，並為其剖析利害。[24]張氏最後決定派遣譚嗣同（1865-1898）、黎元洪（1864-1928）、張彪（1860-1927）等六名屬下，由宇都宮太郎陪同，前往考察日本陸軍，為日後派遣留學生預作準備。[25]明治三十二年三月，神尾光臣復與劉坤一會談。同年四月，川上又派遣其門下要員、[26]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正（1852-1919）大佐，分別於南京（九日）、武昌（十八日）會晤劉、張兩總督。[27]參謀本部一連串主動積極的運作，終使得原本於外交路線上站在「聯俄制日」立場的張之洞和劉坤一，於思想上漸轉向「聯英、日制俄」。其中張之洞思想轉向表現於實際行動上，主要為二大政策：

宗旨。參見〔日〕小島晉治等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 100 年史》（東京：自由國民社，1976），頁 226。

21 〔日〕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第一卷，頁 7。

22 〔日〕黑龍會，《東亜先覚志士記伝》（東京：原書房，1966），下卷，頁 390。

23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68），下卷，頁 654。

24 參見〈湘撫陳寶箴奏密陳日本欲與我聯英或助戰或排解電〉（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入王彥威纂輯，王亮編，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二冊，卷 128-18，頁 2151；張之洞，〈致日本參謀大佐神尾君光臣〉（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收入張之洞撰，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第四集，卷 154-15，頁 2833。

25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第一卷，頁 46。

26 田村怡與造（1854-1903）、福島安正、伊地知幸介（1854-1917）、大生定孝（1846-1919）四人，合稱川上的門下四天王。參見〔日〕松下芳男，《日本軍閥興亡史》（東京：芙蓉書房，2001），上卷，頁 151。

27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下卷，頁 271-2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一，同意延聘日本的軍事教官來華，俾對武昌武備學堂（湖北新式陸軍軍官的養成所）實施日式軍事教育。[28]其二，自光緒二十四到二十九年間（1898-1903），選派湖北、湖南兩省留學生約 100 人負笈東瀛，安排他們進入軍事學校以學習兵事。[29]

（二）預備教育的實施學校——成城學校和振武學校

學習武備的中國學生赴日後，必須先進入成城學校，接受預備教育後，才能正式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在探討該校和中國留學生的關係之前，筆者擬先交代該校和日本國內志願學習軍事者間的關係。

成城學校的前身是明治十八年（1885）一月創立於東京中央區築地的文武講習館，翌年始改為今名，[31]校名取自《詩經．大雅》的「哲夫成城」。明治二十四年（1891）九月，宮內省將位於東京牛込區原町（今新宿區原町）的土地無償撥交給該校使用，[32]校址遂由中央區築地遷往牛込區原町。在戰前的日本，該校主要是針對志願進入陸軍幼年學校、[33]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實施預備教育，亦有畢業生投考海軍兵學校等海軍

---

28 〔日〕渡邊龍策，《近代日中政治交涉史》（東京：雄山閣，1978），頁 85。

29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頁 247。

30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頁 65。

31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留学生史談》（東京：第一書房，1981），頁 193。

32 宮內省為明治憲法下獨立於內閣之外的中央機構，主要職掌是皇室、皇族、華族等相關事務，其長官為宮內大臣。將校地無償撥付給成城學校使用的宮內大臣為土佐藩出身的土方久光（1833-1918）。詳參〔日〕吉川弘文館編輯部編，《近代史必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頁 107。

33 陸軍幼年學校教授欲成為陸軍士官學校或其預科的學生語學及普通學科，同時施予涵養軍人精神之必要教育。根據明治二十九年（1896）的新制度，於東京設立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於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即第一到第六師團的駐地）設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參見〔日〕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上卷，頁 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的軍校，[34]或是進入其他文學校。根據外相廣田弘毅（1878-1948）於昭和十年（1935）五月二十九日在成城學校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典禮上的致詞，可知該校在 50 年間（1885-1935）約有 6,000 名畢業生，其中半數成為日本陸、海軍的將校。[35]由此數字來看，說該校是戰前培育日本陸、海軍將校的搖籃亦不為過。

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武備，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1898）。就在該年新曆十一月，浙江巡撫劉樹棠（1831-?）選派陳其采（1880-1954）、吳錫永（1880-?）、舒厚德（1881-?）、許葆英（1877-1957）等 4 名學生赴日學習武備，此為中國青年留日學習軍事之嚆矢，在清末到民初蔚為風尚。[36]他們四人後來都順利自成城學校畢業，再從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如前所述，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可說是由力主中日提攜以抗俄國的川上操六極力促成。當時兼任成城學校校長的川上操六，[37]決定在明治三十一年為該校中國留學生成立留學生部，[38]並命當時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正兼任「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負責其事，[39]即形式上是由參謀本部的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委託成城學校代為教育來日學習武備的中國留學生。[40]福島職責所在，便是比照該校培育日本籍志願者考上軍校的模式，為中國留學生實施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前的預備教育。[41]

---

34 日本海軍最後一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小澤治三郎（1886-1966）中將，即畢業於成城學校。參見〔日〕秦郁彥，《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頁 174。

35 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ers.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以下簡稱 JACAR），Ref. B05016222300（第 1 畫像目），外務省記錄，H 門東方文化事業，7 類資料，雜集第二卷（B-H-07-02-00-07-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3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3-34。

37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

38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6。

39 JACAR，Ref. C06083559500（第 3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貳大日記，明治 35 年乾「貳大日記 3 月」（陸軍省-貳大日記-M35-3-1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40 〔日〕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東京：日華學會，1939），頁 86。

41 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成城學校中華留學生部沿革》記載，其最初的「教育方針」如下：

> 本校依據特別的教育法，將學生分為文、武兩班，採用自編之日語、日文的教科書，配合各人之目的，授以高等或普通教育，本校畢業後武學生直接成為陸軍士官學校候補生，文學生則進入各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42]

由此可知，畢業自該校的中國留學生日籍學生，升學管道皆不限於軍校。不過該校日籍畢業生中，武科學生和文科學生的比例大約是 1：1，即 6,000 人中各占約 3,000 人。而中國留學生亦是武、文兩科的志願者皆收，但是後者為數不多。根據黃福慶研究，自明治三十一年成城學校成立留學生部，至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起，肄業及畢業於該校的中國留學生計達 1,613 人（其中至 1912 年止，畢業者有 528 人）。[43]

繼浙江派遣吳錫永等 4 人之後，張之洞在宇都宮太郎、福島安正等參謀本部特使的勸說下，亦先後兩次派遣兩湖的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第一次為光緒二十四年，選派了譚興沛、徐方謙、段蘭芳、蕭星垣（1874-?）4 人，[44]除譚興沛中途退學外，其餘 3 人均先後從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45]第二次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張之洞擴大規模，派遣劉邦驥（1868-1930）等 18 名學生赴日，並透過駐上海的日本總領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轉交 18 人半年間的學費 2,850 日圓。[46]劉邦驥等人其後亦順利自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繼浙江、兩湖之後，劉坤一、四川總督岑春煊（1861-1933）、直隸

42 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頁 86。

43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7。

44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189。

45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第四回，頁 706-707。

46 JACAR，Ref. C04013582300（第 2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壹大日記，明治 32 年「壹大日記」（陸軍省-壹大日記-M32-3-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等人亦陸續選派留學生赴日，[47]總計中國各地於光緒二十四年送出之第一批赴日學習武備的留學生共約 70 餘人。誠如黃福慶所指出的，晚清政府雖然極端專制，然而各地方督撫之權力日隆，且率多各自為政。以派遣武備留學生一事，即由各督撫視地方實際需要自行辦理，早期實與中央的練兵處無關。[48]各督撫一則為培植自身勢力，確保所控地盤；二則為了博得開明之美名，故遣送留學生出國學習武備。[49]截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成城學校停止招收中國武備留學生為止，先後畢業於該校者總共有 175 人。[50]

成城學校的日本學生修業期限為五年，但因中國亟需軍事人才編練新軍，日方參酌後，決定採用速成之法，將該校留學生部武科學生修業期間縮短為 16 個月。學科課程方面，前半年以加強日語、日文為主，後 10 個月教授普通科目，內容與一般日本中學校的課程無異；術科課程方面，則有體操、劍術、單兵教練、部隊教練、射擊初步、距離測量等。[51]

最初中國留日武備學生人數尚少，日方先安排東京牛込區藥王寺前町藤城方為學生們的暫時寄宿處。[52]待人數漸增，日方為了方便學生通學，乃於牛込區河田町增設留學生之校外宿舍，又在其北側增築禮堂、教室等，使原有的宿舍和新建的校舍連成一片，命名曰振武學校，並於

47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

48 練兵處成立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 年 12 月 4 日），位於北京錫拉胡同，為指導全國之新軍編練而成立的中央專責機關，以慶親王奕劻（1838-1917）為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1863-1939）為襄辦大臣。下設總提調和軍政、軍令、軍學三司。以徐世昌（1855-1939）為總提調，劉永慶（1862-1906）為軍政司正使，陸嘉谷為軍政司副使，段祺瑞為軍令司正使，馮國璋（1860-1919）為軍令司副使，王士珍（1861-1930）為軍學司正使，陸建章（1862-1918）為軍學司副使。練兵處成立後不久，奕劻以「衰邁多病」為由請辭，實權便落入袁世凱手中。參見牛俊法、張陸、王紹軍著，《百年中國史話：軍制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03。

4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4。

50 明治三十三至三十六年（1900-1903）畢業生依序為 45 名、30 名、7 名、93 名。詳參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6-37。

51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7。

52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正式成立。在擴建過程中，袁世凱捐贈兩萬日圓，為學校擴建經費的主要來源。[53]振武學校係專門為有志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實施預備教育而設，故只招收武科學生。[54]該校成立後，在成城學校修業的中國武備留學生，一律移至振武學校。[55]

光緒三十年四月五日（1904 年 5 月 19 日），練兵處奏定「選派陸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16 條），規定今後凡志願學習武備的學生，須先由各省督撫咨送練兵處，經該處考選及格者始能派遣留學。[56]同時規定今後每年從各省挑選 100 名 18 至 22 歲的學生赴振武學校留學，經費一律由中國政府負擔。[57]同年十二月，練兵處即選派學生 123 人（練兵處官生 104 人，附送之直隸省官生 19 人），送往振武學校留學，並以趙理泰（1868-1925）為監督。清政府派遣武備學生赴日留學一事，至此始制度化，即統一派遣官費（公費）留學生，並擇優津貼自費生，使之成為官費生。[58]

振武學校的修業年限，因時期而有所不同。創立之初比成城學校短 1 個月，即 15 個月。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月，延長 3 個月，為 18

53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1），頁 22。

54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8。

55 李烈鈞（1882-1946）便是由成城學校轉至振武學校就讀的第一期生。詳參〔日〕阿部洋監修，佐藤尚子、蔭山雅博、一見真理子、橋本學編，《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京：日本圖書中心，2005），頁 14。

5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5。

57 劉志強、張學繼，《百年中國史話：留學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40。

58 〈各省自送游學日本陸軍學生名單暨學費操衣事項有關文冊〉（1904 年 8 月-1906 年 6 月），《清朝陸軍部（兵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檢索號一五〇四-102。這份在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四（1906 年 7 月 24 日）由兵部完成的統計資料顯示，留日學習陸軍的官費生計 376 名，自費生 22 名，由自費改官費者 69 名，不明官費或自費者 71 名，共計 538 名。此數字除可顯示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赴日學習武備之蔚然成風外，亦可見清政府以官費生為主流及改自費生為官費生之既定政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月。次年，再改為 2 年，旋又改為 3 年。[59]此後直到該校於大正三年停辦為止，修業年限一直維持為 3 年。振武學校停辦後，日本方面熱心日中兩國軍事教育交流人士，利用其基金成立「振武義會」，揭櫫該會宗旨為「予研究軍事而留學之鄰邦各國學生方便，並促進國民間之互相親睦」。[60]該機構雖已不是學校，然獎掖留學教育的精神依然傳承。

（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教育

陸軍士官學校是培育日本陸軍基層軍官幹部的搖籃，前身為明治元年（1868）於京都成立的兵學校（後改稱兵學所）。[61]翌年九月遷往大阪城附近，改稱兵學寮，[62]由主張建立國民徵兵制度的兵部大輔（次官）大村益次郎（1825-1869）主持。[63]大村為培育徵兵制度下的軍官幹部，聘請法國教官對出身諸藩武士的入學者施以法式兵學教育。[64]大阪兵學寮後又改稱陸軍兵學寮，並於明治四年（1871）隨著鎮臺（明治前期陸軍的軍團）制創設遷往東京皇居附近的和田倉門外。[65]

根據明治七年（1874）十月公布的「陸軍士官學校條例」，陸軍兵學寮改稱為陸軍士官學校，由陸軍省長官陸軍卿直接管轄，首任校長為曾我祐準（1844-1935）。同年十二月，陸軍士官學校創校於牛込區市之谷台，從此市之谷成為該校代名詞。[66]該校延聘法國教官教授法式兵學，故教育制度亦模仿法國，稱為「士官生徒制度」。陸士招收對象為初中

5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7。

60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上卷，頁 713。

61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頁 41-42。

62〔日〕稻葉稔，《大村益次郎——軍事の天才といわれた男》（東京：PHP 研究所，1998），頁 364。

63〔日〕小島慶三，《戊辰戦争から西南戦争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頁 123。

64〔日〕高橋典幸、山田邦明、保谷徹、一ノ瀬俊也，《日本軍事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頁 302-303。

65〔日〕武岡淳彦，《日本陸軍史百題——なぜ敗れたのか》（東京：亞紀書房，1995），頁 14。

66〔日〕寺田近雄，《日本軍隊用語集》（東京：立風書房，1997），頁 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畢業生，修業年限因兵科不同而異，步兵科、騎兵科二年（1876 年改為三年），砲兵科、工兵科三年（1876 年改為四年，1881 年再改為五年）。自明治八年（1875）二月的第一期士官生徒入學，至明治二十年（1887）六月陸軍士官學校條例改正為止，士官生徒制度共延續了十一期，計有 1,285 人畢業。[67]

誠如前述，川上操六、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於明治十九到二十二年間進行軍制改革，將日本陸軍的建軍模式從法國式轉換為普魯士式。此項改革表現在陸軍士官學校之招生制度上，即該校從法國式的士官生徒制度，轉變為普魯士式的「士官候補生制度」。士官生徒制度至明治十九年入校的第十一期生為止，便劃上了休止符，翌年以降的學生悉數適用士官候補生制度。[68]

士官生徒制度和士官候補生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乃直接招收士官生徒（學生）入學接受軍事教育，畢業後逕以軍官任用；而後者在入學前，入學考試錄取的士官候補生須先於每年十二月以一等兵身分進入指定的聯隊或大隊，親身體驗士兵行伍生活。到翌年六月升為上等兵為止，共在原隊接受為期 7 個月的士兵勤務訓練。翌年八月升為伍長，入伍滿一年後的翌年十二月升為軍曹，亦即在原隊接受下士官 5 個月的勤務訓練。在經歷這一年間由一等兵升至軍曹並學習各項勤務後，於升上軍曹之際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於該校經一年六個月的學習後，畢業時晉升為曹長，再以曹長身分回到二年半前入伍的原隊，擔任半年的見習少尉，經由原隊之將校團推薦，方可正式取得少尉任用資格。[69]比較新舊兩套制度，可知新制士官候補生制度下之掛階（任官），由於多了一年的士兵、士官經歷和半年的見習少尉資歷，較舊制士官生徒制度要慢一年六個月左右。[70]以上在論述清末中國留學生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

67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巻，頁 42。
68 〔日〕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東京：文京出版，2000），頁 24。
69 〔日〕大濱徹也、小澤郁郎編，《帝國陸海軍事典》（東京：同成社，1995），頁 101。
70 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適用士官候補生制度時，筆者為求行文明快，所提到的各項軍階仍以日本陸軍中的名稱為主。而日本陸軍、清末新軍及民國陸軍之軍職、軍階對照表，可參閱附表五。

陸軍士官學校自從改為士官候補生制度後，招生對象亦從士官生徒制度時代的初中畢業生改為高中畢業生。除既有的步、騎、砲、工四兵科外，明治二十九年（1896）又增設輜重兵科。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日本陸軍官制改革，於軍政機構陸軍省之下，設立了一個專掌軍學、訓練的機構——教育總監部，[71]自此陸軍士官學校便歸教育總監部管轄。自明治二十一年（1888）十一月，經歷一年部隊生活的第一期士官候補生入學，至昭和十七年（1942）四月第五十八期士官候補生入學為止，士官候補生制度共延續了五十八期，[72]計有 37,461 人畢業。若加計前十一期的士官生徒畢業人數 1,285 人，則陸士自明治八年（1875）創校，至昭和二十年（1945）關閉，前後七十年間，共計招收六十九期，總畢業人數為 38,746 人。[73]

清末中國留學生之赴日學習武備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於日本國內早在十一年前（1887）已將陸軍士官學校的招生制度，更改為普魯士式的士官候補生制度，故中國的武備留學生從第一期生（1901 年

71 教育總監部的前身原為明治二十年（1887）五月設立的監軍部，係一個獨立於陸軍省之外的機構。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監軍部改組為教育總監部之後，旋依「教育總監部條例」規定，受陸軍大臣管轄。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依敕令第一百五十七號的規定，教育總監部再次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詳參〔日〕三浦裕史，《軍制講義案》（東京：信山社出版，1996），頁 45。自此日本陸軍正式確立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即以陸軍省掌軍政，參謀本部掌軍令，教育總監部掌軍學，此三機關合稱為陸軍的「三官衙」。其各自的機關首長，即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教育總監三人，習慣上合稱「三長官」。詳參〔日〕加藤陽子，〈陸軍中堅層の挫折：二・二六事件後の政治過程〉，收入氏著，《模索する一九三〇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頁 209-212。

72 第五十八期的士官候補生於昭和二十年六月掛階，係日本陸軍史上最後一批少尉軍官。若不以畢業掛階，而單以入學做為計算基準，改制後（不含士官生徒制度之舊制十一期）的陸軍士官學校一共招收了 61 期，其中除最後一期外，皆為士官候補生制度。詳參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26-228。

73 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26-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 月入學）開始，便和日本國內志願進入陸士的學生（畢業後為第十四期生）一樣適用該制度。根據黃福慶的統計，自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二年（1900-1910），中國武備留學生於接受成城、振武兩校的預備教育後，進入聯隊者 727 人，其中自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者計有 673 人。[74]

三、留日士官生參與中國軍事近代化

（一）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建立

近代軍事史上的人事制度中有兩大制度，即上層將校的參謀制度，和下層士卒之徵兵制度。近代的參謀制度和徵兵制度，分別濫觴於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普魯士和法國，兩者皆為因應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動盪的情勢。日本於明治維新初期，旋仿效法國於大革命後向平民徵兵，俾利對抗各國貴族聯軍之作法，[75]先於明治六年（1873）一月發布徵兵令，[76]以士、農、工、商四民共同承擔國防重任為號召，[77]建立了亞洲第一支基於徵兵制所組建的近代陸軍。再於明治十一年（1878）十二月，仿照德國之軍政、軍令二元制，[78]將參謀本部自軍政機構陸軍省中獨立出來，成為直屬天皇之陸軍軍令專責機關。[79]日本其後決定以德國培養各級參謀將校的陸軍大學校為模範，於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延聘梅克爾（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1842-1906）少佐為日本陸軍大學

7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8。

75 〔日〕大江志乃夫，《徵兵制》（東京：岩波書店，1981），頁 24-27。

76 〔日〕加藤陽子，《徵兵制と近代日本，1868-1945》（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51。

77 〔日〕戸部良一，《日本の近代 9：逆説の軍隊》（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 46-47。

78 〔日〕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5），頁 31-35。

79 〔日〕竹山護夫，〈陸海軍中央機関の制度変遷〉，收入〔日〕平川祐弘、竹山護夫合著，《古代中国から近代西洋へ》（東京：名著刊行會，2009），頁 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的兵學教官，[80]開始導入參謀將校養成所不可或缺的戰術、戰史教育及參謀演習旅行等。[81]源自近代法、德兩國的徵兵制度和參謀制度，遂成為維新後的日本建立精強軍事力量的兩大支柱。往後軍政、軍令二元制發展為國務（內閣）和統帥（天皇）分離的制度，促使軍部獨大，進而挾持日本全國步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之路，可謂影響近代日本的歷史發展至鉅。

清末中國透過招聘日籍軍事顧問、教官來華協助建軍或講授兵學，以及派遣武備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等作法，亦觸及徵兵、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制，並試圖引進。以下筆者將分別申論之。

在徵兵制度的倡議方面，光緒三十年八月（1904 年 9 月），練兵處訂定全國分省編練陸軍三十六鎮（師）的計畫，其中規定大省編練三鎮，中省編練二鎮，小省編練一鎮。[82]根據這個構想，練兵處除於翌年規定所需軍費由各省自行籌辦外，也明定徵兵方法、服役年限等一切軍制，均仿照日本現行制度辦理。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十月（1907 年 11 月），清廷宣稱新式陸軍中已有採行徵兵制度者，即北洋的第四鎮（駐直隸馬廠）、第二鎮（駐直隸遷安），及南洋的第九鎮（駐南京）。然其與日本不同，並非全體國民應盡義務的徵兵制度，只能算是義勇兵制度和傭兵制度的折衷混合體。[83]

上述駐南京的第九鎮（師），採行糅合義勇兵制和傭兵制的準徵兵制度，這是曾任兵部尚書兼山東巡撫的周馥（1837-1921），於擔任兩江

80 〔日〕上法快男，《陸軍大学校》（東京：芙蓉書房，1973），頁 104。

81 〔日〕黒野耐，《参謀本部と陸軍大学校》（東京：講談社，2004），頁 71-75。

82 所謂全國編練陸軍三十六鎮的計畫，除已成立的京畿四鎮、直隸二鎮（此即北洋六鎮）外，另規定江蘇、四川各三鎮；湖北、廣東、雲南、甘肅各二鎮；山東、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廣西、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尚未建省，置鎮守使）、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詳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3-57。

83 東亞同文會，〈清國新式陸軍ノ評論〉，《東亞同文會報告》95 回（1907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督兼南洋大臣任內（1904 年 9 月-1906 年 7 月）所進行的兵制改革，由時任第九鎮統制（師長）的徐紹楨（1861-1936）協助，徐曾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奉派赴日考察軍事。在徐紹楨麾下，實際負責在南京附近試辦徵兵制度者，為一批日本陸士畢業生。江寧督練公所（光緒三十年八月〔1904 年 9 月〕設立之各省訓練新軍的機構）所轄三個部門——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其總辦（處長）分別由日本陸士第一期砲兵科畢業的許葆英、第三期砲兵科章亮元和第三期工兵科姚鴻法（1882-1947）擔任。此外，第九鎮轄下的步隊第十七、十八兩協（旅）中，第十八協統領（旅長）亦由陸士第一期步兵科吳錫永擔任。[84]

然而徵兵制未及實行而國體已變。[85]清末的中國之所以無法順利推動真正的徵兵制度，和戶口調查不確實、[86]重文輕武的民族性、開辦經費拮据、缺乏基層軍官等因素密切相關。[87]

反觀參謀制度則是順利引進，清廷試圖建立如同德國、日本一般的軍政、軍令二元制。首先探討參謀制度引進的情形。清末所謂的北洋，原指長江口以北的天津、牛莊（今海城）、登州（今煙臺）三口岸，[88]後泛指三口岸所在之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寧）、山東三省的總稱。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 年 2 月），袁世凱延聘天津駐屯軍參謀立花小一郎（1861-1929），[89]出任直隸省的軍務總匯之所——北洋軍政司的

84 東亞同文會，〈周總督ノ陸軍官制擴張案〉，《東亞同文會報告》80 回（1906 年 7 月 26 日，東京），頁 22-23。

85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47。

86 東亞同文會，〈陸軍部ト徵兵事宜〉，《東亞同文會報告》99 回（1908 年 2 月 26 日，東京），頁 39。

87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兵制改革〉，《東亞同文會報告》103 回（1908 年 6 月 26 日，東京），頁 37。

8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89。

89 〔日〕中村義、藤井昇三、久保田文次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2010），頁 360-361。根據《辛丑條約》第九條的規定，中國允許包括日本在內的條約簽字國 11 國，為保護北京的公使館區域及北京到海口間的交通起見，得在鐵路沿線的 12 個處所駐兵。當時日本稱這支部隊為「清國駐屯軍」，因其司令部設於天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贊軍政會議議員（軍事顧問）。[90]光緒二十八年，袁即在立花小一郎的協助規劃下，於保定城內直隸總督署西側設立了參謀學堂。該學堂隸屬於北洋軍政司參謀處，並由參謀處總辦段祺瑞（1865-1936）兼學堂總辦（即校長），[91]此為中國培養新軍參謀軍官的濫觴。參謀學堂學制以八個月為一期，每期招收學員 160 名，由各部隊軍官遴選之。此外，又仿照日本參謀本部的外局——陸地測量部負責軍用地圖測繪的作法，[92]於參謀處之下設立測繪學堂，亦由段祺瑞擔任學堂總辦。參謀處之下設有三股：調派股除負責遴選參謀學堂的學員外，也規定授課內容；謀略股負責選派學成者擔任各鎮（師）、協（旅）的參謀官；測繪股除遴選測繪學堂學員，也負責將學成者派赴各鎮擔任測繪人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參謀學堂停辦，翌年袁世凱又於保定原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堂址，[93]成立了北洋軍官學堂，由段祺瑞任督辦，趙理泰

海光寺，故又名天津駐屯軍。參見〔日〕古野直也，《天津軍司令部，1901-1937》（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頁 54-64。

90 北洋軍政司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 6 月），由袁世凱自兼督辦，光緒三十年八月（1904 年 9 月）改稱直隸督練公所。北洋軍政司下轄兵備處（管轄考功、執法、籌備、糧餉、醫務等股）、參謀處（管轄謀略、調派、測繪等股）、教練處（管轄學務、校兵等股）等三處部門，以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總辦。此乃立花小一郎仿效 1900 年 4 月日本軍制上甫告確立之軍政、軍令、軍學三權分立的精神，並將之導入北洋軍政司之部門設立的結果。此機構不僅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1903 年 12 月）清廷於中央設立練兵處的藍本，更是各省成立督練公所的楷模。參照李宗一，《袁世凱傳》（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00。並參照袁世凱，〈直隸創設軍政司擬定試辦章程摺〉（1902 年 6 月 21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天津：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1987），中冊，卷 16，頁 536-542。

91 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新華書店，1987），頁 7。

92 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頁 61。

93 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 6 月），遴選曾帶兵的武弁，以八個月為卒業之期，業成經考選優等者即酌委軍事。此學堂由馮國璋任督辦，雷震春（?-1919）任總辦，總教習則為日籍教官多賀宗之（1872-1935）。光緒三十年七月（1904 年 8 月）該學堂停辦後，多賀宗之旋轉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擔任「堂教」，續執教鞭。詳參袁世凱，〈建設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擬訂試辦章程摺〉（1902 年 6 月 21 日），收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監督，隸屬北洋大臣管轄。該校為清末中國之最高軍事學府，負有造就參謀將校和高級軍官之責，民國以後改組為陸軍大學。至此，袁世凱於是將北洋軍官學堂，與先前北洋所開辦之各種陸軍學堂一同納入自身掌控之下。[94]

在引進參謀制度的軍制革新中，可看到自陸士畢業的歸國留學生之活躍。以湖北一地來說，當時練兵處（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兵部合併為陸軍部）鑒於各省新軍人數漸增，為求「通國一貫，脈絡相連」，俾使「將帥不得擅立主名，軍隊亦不得自為風氣」，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奏定立軍制略，令全國新軍一律改稱為陸軍，並採用統一的建制番號。[95]為此，湖北新軍亦納入全國陸軍的體制，其第一鎮（統制張彪）更名為陸軍第八鎮，並由藍天蔚（1878-1922）擔任正參謀官。同時湖北新軍的第二鎮（統制黎元洪）亦縮編為第二十一混成協，由陸士第一期步兵科畢業的吳茂節（1877-1960）擔任正參謀官。[96]

此外，由軍諮處制定之〈陸軍參謀章程〉中所規定的參謀遴選辦法，即須畢業於陸軍大學堂（設立之前為軍官學堂）的基本條件，[97]同樣也承襲自德國梅克爾少佐為日本所設計的制度。由此可見，陸軍大學校的制度由德國傳至日本之後，再由日本傳到了中國。

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中冊，卷 16，頁 543。另參閱李宗一，《袁世凱傳》，頁 114。

94 清政府本擬將陸軍最高學府——陸軍大學堂設於京師，袁世凱亦自知「論其章制，仍應設於京師」；然又藉口「而高等教習，急切尚難多選，仍不能不借才異地（指延聘外國教習），在京延訂亦多未變」，故乃奏稱「略事變通，名曰軍官學堂，即在保定省城設立」，搶先朝廷一步開辦相當於陸軍大學堂的北洋軍官學堂。參見袁世凱，〈北洋設立軍官學堂擬訂試辦章程請飭立案摺〉（1906 年 6 月 20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39，頁 1320-1321。

95 袁世凱，〈北洋常備軍擬一律改為陸軍各鎮片〉（1905 年 2 月 25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32，頁 1090。

96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 1860-1916》，頁 246。

97 東亞同文會，〈陸軍參謀章程〉，《東亞同文會報告》120 回（1909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軍政、軍令二元制在清末引進中國的情形，論述如下。清朝末葉所謂同治中興，其主要事功基本上為漢人督撫所建立，如湘軍創始者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及淮軍創建者李鴻章之平定太平天國起事和捻變。曾、左、李等人雖以戰功暫時保住了風雨飄搖的清室江山，惟同、光年間的軍權亦因此旁落漢人督撫之手。繼曾、左、李而起的漢人大員為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又稱袁項城），因其一手掌握北洋陸軍，引起滿洲親貴猜忌。清末民初政治要員曹汝霖（1877-1966）在其回憶錄中，對當時滿洲親貴作法及其所引發的後遺症等有如下獨到的剖析：

> 項城內調為軍機大臣，北洋新軍統歸陸軍部節制。陸軍部尚書鐵寶臣（按：鐵良），亦滿員中之佼佼者，以為軍權歸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權；反對行憲，亦是此君。豈知小站新軍由項城一手訓練而成，將領都是項城的心腹，向來只知有袁宮保，豈鐵寶臣所能轉移。後以良賚臣之建議，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將領，意在分化原來之將領。反起了派別之爭，成為革命之先鋒，豈非人事之不臧歟。[98]

由上可知，陸軍部尚書鐵良（1863-1939）力求中央集權，極力提拔陸士第二期步兵科畢業的良弼（1887-1912）及其他滿族出身的青年將校；[99]並接受良弼建議，擇優錄用日本陸士畢業生掌管軍事，目的便是為了打破袁世凱所壟斷的北洋軍權。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如此一來反而加深了

98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 46。

99 良弼，愛新覺羅氏，字賚臣，隸上三旗之一的鑲黃旗，為鴉片戰爭時的兩江總督伊里布（1772-1843）之孫。清末時擔任禁衛軍第一協（旅）的統領官（旅長），後升軍諮府（參謀本部）軍諮使。《清史稿》中稱其「平日以知兵名，改軍制，練新軍，立軍學，良弼皆主其謀。尤留意人才，自將帥以至軍士，莫不延納」。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 42 冊，卷 470，列傳 257，頁 12799。良弼為清末滿臣中的棟樑之才，武昌起事後，思以立憲消弭革命，為滿清權貴所組成之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的健將，上下皆恃以為重。民國元年（1912）一月，遭京津同盟會的刺客彭家珍（1888-1912）襲擊殞命，清室權貴震慄，於是宣統帝溥儀（1906-1967）遜位之局乃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洋派和留日士官派的對立，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南北對立等諸多史實中均可看出，影響甚為深遠。

滿洲的皇族親貴竭力推動中央集權政策，其中以鐵良最為熱衷。[100]當時鐵良的作法，實為仿效普魯士的參謀總長大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 1800-1891）將軍之統一日耳曼邦聯兵制的故智，極力將各省兵權收歸中央政府。[101]光緒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 3 月），陸軍部即由鐵良擔任調查主任，參酌日本的制度，著手研究設立新的軍令系統機構——軍諮府。[102]然而，此與德國、日本之軍令系統機構原先均附屬於軍政系統機構，後來才獨立出來的情形一樣，[103]軍諮府在其組織、機能尚未完備建全到足堪獨立作業之前，暫名軍諮處，[104]和籌辦海軍處同屬陸軍部管轄，兩者後來才分別獨立為軍諮府、海軍部。[105]

〈軍諮處暫行章程〉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規定：「軍諮處為贊助皇上，通籌全國陸海各軍事宜之所。凡關於國防用兵之一切的命令計畫，悉由本處擬案經親裁後下陸海軍部（海軍部未設以前為海軍處）辦理。」[106]而

100 東亞同文會，〈陸軍兵學校設置計畫〉，《東亞同文會報告》87 回（1907 年 2 月 26 日，東京），頁 31。

101 東亞同文會，〈兵權統一ノ難〉，《東亞同文會報告》88 回（1907 年 3 月 26 日，東京），頁 27。

102 東亞同文會，〈軍諮府設立〉，《東亞同文會報告》88 回，頁 26。

103 擔任日本駐德國公使館武官的桂太郎，於明治十一年（1878）七月返國就任陸軍省轄下的參謀局諜報提理一職。桂太郎力主仿效德國之軍政、軍令二元制，將負責作戰發令、動員計畫等軍令業務的參謀局，自軍政系統的陸軍省分離出來。由於桂太郎的籌劃，同年十二月制定了《參謀本部條例》，參謀本部遂得自陸軍省獨立。至此，日本遂和德國相同，成為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國家。參照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頁 28-31。

104 東亞同文會，〈軍諮處設立情況〉，《東亞同文會報告》117 回（1909 年 8 月 26 日，東京），頁 52。

105 籌辦海軍處於宣統二年十一月三日（1910 年 12 月 4 日）升格為海軍部，以載洵（1885-1949）為海軍大臣。軍諮處則於宣統三年四月十日（1911 年 5 月 8 日）升格為軍諮府，以毓朗（1864-1922）、載濤（1887-1970）為軍諮大臣。參見李守孔，《中國近代史》，頁 726。

106 東亞同文會，〈軍諮處暫行章程〉，《東亞同文會報告》119 回（1909 年 10 月 2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治二十六年（1893）十月三日，日本政府在改正的〈參謀本部條例〉中，第一條規定「參謀本部為掌國防用兵其事之所」；第二條規定「參謀總長由陸軍大將或中將一人親補，直隸於天皇參畫帷幄的軍務，並統轄參謀本部」；第三條規定「參謀總長策案有關國防計畫及用兵之條規，經親裁後將屬軍令之物移交陸軍大臣奉行」。比對這二份文件，可知清廷〈軍諮處暫行章程〉的第一條乃日本〈參謀本部條例〉第一至第三條之濃縮精華版。由此看來，清廷欲使軍令機構（軍諮處）脫離軍政機構（陸海軍部）的作法，目的是使軍政、軍令二元化，將建軍備戰（軍政）和調動軍隊（軍令）的權力皆收歸中央所有，以制衡袁系色彩濃厚的北洋軍權。而此軍制上的重大變更，則是深受德國、日本之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影響。[107]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1908 年 12 月），清廷仿照日本近衛師團軍制，於各旗營兵丁中挑選精壯者 12,000 名，組成禁衛軍，[108]由監國攝政王載灃（1883-1951）親統，貝勒載濤、毓朗和尚書鐵良出任專司訓練大臣，[109]良弼擔任第一協（旅）的統領官（旅長）。軍政系統方面，除續由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外，[110]籌辦海軍大臣由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1859-1952）出任。軍令系統方面，軍諮處設管理事務大臣兩人，分別由毓朗、載濤兩位貝勒出任。以上種種人事安排，均是滿族親貴亟欲將兵權收歸中央所有的具體表現。然由於清末八旗子弟多沾染紈袴習氣，東渡日本陸士習武的旗人在人數上又遠不及漢人，故鐵良、良弼等為對

東京），頁 66。

107 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37：大本営》，頁 43。

108 東亞同文會，〈禁衛軍〉，《東亞同文會報告》110 回（1909 年 1 月 26 日，東京），頁 53。

109 參見馮明珠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稿本專輯——志》（臺北：沉香亭企業社，2009），第六冊，頁 3100-3101。

110 宣統二年（1910）八月，繼鐵良之後出任陸軍部尚書者為擔任駐德公使六年之久的旗人蔭昌（1859-1928）。參見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陸軍部尚書蔭昌氏〉，《東亞同文會支那調查報告書》1 卷 4 號（1910 年 8 月 15 日，東京），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抗袁系的北洋勢力，遂起用多位日本陸士的非旗人畢業生，並委以重任。如軍諮處的軍諮正使馮國璋、軍諮副使哈漢章（1879-1953），[111]和第一廳廳長盧靜遠（1874-1945）、第二廳廳長馮耿光（1882-1965）、[112]第三廳廳長陳其采、[113]第四廳廳長章遹駿（1877-?）及第五廳廳長姚寶來皆非旗人。其中，哈漢章和五位廳長中的盧靜遠、馮耿光、陳其采、章遹駿四人，皆為日本陸士第一、二期的畢業生。[114]由此可知，在清末滿清權貴致力將軍權收歸中央的過程中，陸士出身之中國留學生在軍諮處（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

在清末朝野上下吸收西法以改革軍事、編練新軍的潮流中，日本是繼德國之後第二個派遣軍事顧問、教官赴華，協助清廷進行軍事建設的國家。即以畿輔重鎮所在地直隸為例，自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延聘立花小一郎出任北洋軍政司軍事顧問後，日本陸軍校尉便絡繹於途，紛紛受

111 哈漢章，字雲裳，為湖北漢陽出身的回族。宣統元年五月（1909 年 6 月），在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所奏薦的陸軍人才中，排名第一為兩江督練公所總參議舒清阿（1877-?），排名第二的即為哈漢章，排名第三的為陸軍部軍學司司長良弼。其下還有軍制司司長易迺謙（1880-1936）、盧靜遠、江陰要塞工程局總辦章亮元（1876-1959）等。參見〔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宣統政紀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第一冊，頁 245。又根據附表四可得知，以上 6 名皆出身自日本陸士中國留學生之前三期，可知彼等在清末的軍事改革中受到重用。

112 馮耿光，字幼偉，廣東番禺人。馮擔任軍諮處第二廳廳長時，每月以俸祿銀四百兩之半額幫助時年方十二、三歲的梅蘭芳（1894-1961），使其日後得以成為京劇四大名旦之首。民國三年（1914）五月，馮曾擔任袁世凱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的軍事顧問。參照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 40-41。

113 陳其采，字藹士，浙江吳興人，是清末最早派赴日本學習武備的四名留學生之一。其采為蔣中正（1887-1975）的結義兄長陳其美（字英士，1878-1916）之胞弟，亦為主管國民黨黨務的「CC 系」負責人——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1900-2001）兄弟的三叔。參見查顯琳，《扶顛持危——陳英士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頁 4-5。

114 哈漢章為第二期步兵科，盧靜遠為第一期砲兵科，馮耿光為第二期步兵科，陳其采為第一期步兵科，章遹駿為第一期工兵科。非陸士出身的為馮國璋和姚寶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聘至北洋軍擔任練兵顧問或軍校教官。

由於獲得滿清中央政府在財政上的鼎力支持，[115]加上日本軍事顧問、教官擘劃協助，清末的新軍（1905 年 2 月起一律改稱陸軍）建設中，成果最宏、收效最速的首推袁世凱奉旨編練的北洋六鎮（師）。[116]光緒三十三年（1907），北洋六鎮總兵力共約 7 萬人，[117]除第一鎮（統制為鐵良）係由原來的「京旗常備軍」改編而成外，[118]其餘五鎮均源自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的嫡系部隊。[119]北洋六鎮的成立背景，除肩負畿輔重地防務以鞏衛京師，和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爆發的日俄戰爭亦有因果關係。由於清廷宣布劃遼河以東為日俄戰區，[120]袁世凱有感於守備遼河以西之中立地帶兵力不足，為了國防上的迫切需求，遂加速北洋六鎮的建軍工作。[121]

自光緒二十六年底（1900）下詔變法起，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立憲運動止，於此所謂「庚子後的新政」時期，作為軍事新政的一環，[122]袁世凱帳下的日本練兵顧問、教官，亦將日本陸軍自明治建軍後，每年秋季舉辦軍事演習的慣例引進北洋軍中。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北洋六鎮

115 文公直曰：「袁世凱既至北洋，即藉清政府雷霆萬鈞之力，吸全國之財以供北洋一區練兵之用。」參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40。更具體地說，袁世凱係以練兵處會辦練兵大臣的名義，將各省認籌的練兵費集中用於北洋一地。根據李宗一的統計，光緒三十一年各省實解的練兵費，總計九百零十一萬兩，其中便有六百多萬兩用於北洋各鎮的建設上。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頁 102。

116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模範陸軍〉，《東亞同文會報告》77 回（1906 年 4 月 26 日，東京），頁 28。

117 第一鎮駐直隸保定，第二鎮駐直隸遷安，第三鎮駐保定、錦州，第四鎮駐直隸馬廠、小站，第五鎮駐山東濟南，第六鎮駐近畿南苑。參見東亞同文會，〈清國新式陸軍ノ評論〉，《東亞同文會報告》95 回（1907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43。

118 〔日〕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頁 117。

119 牛俊法、張陸、王紹軍著，《百年中國史話：軍制史話》，頁 102。

12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41。

121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陸軍（中）〉，《東亞同文會報告》131 回（1910 年 5 月 30 日，東京），頁 20。

122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頁 7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次第組訓完畢，皆告成立。清廷為驗收其訓練成果，在同年九月二十五日（10 月 23 日）起三日間，於直隸省河間府舉行秋操（即日軍的秋季演習），[123]此亦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且大規模之新式陸軍野戰演習。[124]此時距日俄戰爭結束未及半年。

河間秋操時，六鎮中抽調出近半數兵力，約 35,500 人，分成攻（南）、守（北）兩軍，第一鎮統制（師長）王英楷（1861-1908）擔任自山東北上進攻的南軍之總統官（軍司令官），[125]第四鎮統制段祺瑞擔任自保定南下防禦的北軍之總統官。南軍攻擊、北軍守禦，演習會操於河間一帶。袁世凱和鐵良擔任閱操大臣，馮國璋擔任閱兵處總參議，各國駐華使節暨武官、中外記者、各省代表等均受邀觀操。演習中，外國武官曾目睹約 20 名左右的日本軍人擔任指揮工作，他們就是協助擘劃此次秋操的日本軍事顧問團。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906 年 1 月 8 日），袁世凱曾上奏章請清廷頒贈勳章嘉獎之，[126]以表揚彼等對中國建設新式陸軍

123 東亞同文會，〈清國秋季大演習〉，《東亞同文會報告》68 回（1905 年 7 月 26 日，東京），頁 32-33。

124 文公直對此次演習曾評曰：「此一役也，仿列邦之成規，創中國所未有。雖未極燦然大備，要使在伍之將士，人人得知戰鬥狀況及己身擔負之責任，平日所授之課，一一均見諸實施。作戰之計畫，種種胥求其賅備，亦足以導國民以尚武，練萬眾為一心矣。」參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8。

125 王英楷為民國時直系軍閥要人、陸士第六期步兵科孫傳芳（1885-1935）之姊夫，也是將北洋軍中之德國教官所引進的德語操練用語，改成通俗易懂之華語訓練用語（如「立正」、「稍息」）的創始人。身兼北洋督練公所總參議官的王英楷，在北洋軍中的地位僅次於袁世凱，負責彙整兵備、參謀、教練三處之議而裁決之，可謂北洋陸軍全體的樞紐。王英楷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四人，素有袁世凱麾下四大天王之稱。後因其病故，餘三人方被改稱「北洋三傑」。參見〔日〕宗方小太郎，〈北洋督練處總參議の交迭〉（報告第一百七十一號，1906 年 2 月 20 日），收入〔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東京：原書房，1975），頁 165；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一卷，頁 162。

126 袁在奏章中曰：「再：北洋創練新軍，一切營章操典，略仿各國成規。而日本兵制，取則歐洲，其兵書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於譯錄。曾經臣延聘日本武備人員，翻譯該國兵書，藉資考證。本年舉行會操，為中國創辦之事，當派令各該譯員襄同經理，深資得力。核其在事勤勞，自宜量予獎勵。相應請旨將日本炮兵少佐坂西利八郎賞給正參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見成效之貢獻。

河間秋操舉行翌年，即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五日（1906 年 10 月 22 日）起三日間，袁世凱指揮的北洋陸軍，聯合張之洞指揮的湖北陸軍，於河南省彰德府和湯陰縣之間，[127]舉行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秋季野戰演習，名曰彰德秋操。[128]南北兩軍共動員三萬三千九百餘人，[129]由第三鎮統制段祺瑞擔任北軍（攻擊軍）之總統官（軍長），[130]第八鎮統制張彪擔任南軍（防禦軍）之總統官。[131]負責講評的閱操大臣仍為袁世凱和鐵良，[132]王士珍為閱兵處總參議。日本陸士第二期步兵科畢業的哈漢章為中央審判官長，馮國璋為南軍審判官長，哈漢章陸士之同期同兵科同學良弼為北軍審判官長。陸士第一期砲兵科盧靜遠擔任遞運官，同期工兵科章遹駿擔任傳達官。並由首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法律的蔡紹基（1859-1933）擔任外賓接待官；袁世凱麾下的重要幹部，日後成為皖系軍閥中心人物之一的倪嗣冲（1868-1924）擔任內賓接待官。[133]此外，各

衙；……，以資酬獎。除咨外務部查照外，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參見袁世凱，〈請賞給日本炮兵少佐坂西利八郎等寶星片〉（1906 年 1 月 8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36，頁 1218。

127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結了〉，《東亞同文會報告》84 回（1906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33-34。

128 袁世凱，〈校閱本年陸軍會操先將大略情形恭摺復陳摺〉（1906 年 10 月 28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41，頁 1387-1388。

12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9。

130 在段祺瑞麾下擔任該軍總參謀官的，為陸士第一期砲兵科陸錦（1879-1946）。和陸錦同期同兵科張紹曾，時任第五混成鎮正參謀官；同期騎兵科王廷楨，時任第五鎮（師）馬隊標統（團長）。參見東亞同文會，〈大演習北軍ノ各官〉，《東亞同文會報告》81 回（1906 年 8 月 26 日，東京），頁 22。

131 東亞同文會，〈秋季陸軍大演習〉，《東亞同文會報告》83 回（1906 年 10 月 26 日，東京），頁 39。

132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結了〉，《東亞同文會報告》84 回，頁 33-34。

133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係員〉，《東亞同文會報告》80 回（1906 年 7 月 26 日，東京），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省督撫所派觀操代表一律獲派為審判員。[134]

由以上名單可看出，兩個閱操大臣及北、南兩軍的審判長，都是一滿一漢的組合；而所派的滿洲旗人，正是排斥漢族和反對袁世凱主持訓練北洋六鎮最力的鐵良和良弼。此外，在此次演習中扮演重要角色者，除袁世凱嫡系的北洋軍官外，留學日本陸士畢業生亦受到重用，並逐漸嶄露頭角。

此次演習中，還可見到北軍方面有坂西利八郎（1871-1950）、寺西秀武（1869-1951）等袁世凱之日本軍事顧問的積極參與。[135]此外，彰德秋操的評比結果，根據東亞同文會特派觀操的某上尉所云，北洋陸軍在將校的素養、士官兵的訓練、各級指揮官的聯繫、人馬軀幹的整一、武器被服裝具的一致等方面，均明顯優於湖北陸軍。[136]由此可知，北洋六鎮為清末全國新軍建設中戰力最為突出者，這支武力在日後也成了袁世凱左右政局的絕佳資本。

（三）各級軍事學校的經營

從清末至民初，近代中國之軍事人才除行伍出身者外，[137]透過近代軍事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主要有四大來源，依時間先後順序，分別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生班的畢業生、各省講武堂等軍事學校畢業生、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以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其中以

134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3。

135 東亞同文會編，《続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73），下卷，頁 819。

136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陪觀記〉，《東亞同文會報告》84 回，頁 33-35。演習的結果，各審判官依據戰理秉公評斷，曾有「南軍馬隊，距敵尚遠，遽爾衝鋒，既致紊亂隊形，復亦疲敝馬力，未免稍涉張皇。北軍較為穩固，然過於持重，亦覺有誤時機」之評語。參見袁世凱，〈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1906 年 11 月 1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41，頁 1388-1391。

137 行伍出身但終能憑藉戰功累積而成為軍事人才者，以馮玉祥（字煥章，1882-1948）的國民軍（西北軍）系將領為主幹。其中較著名者有韓復榘（1890-1938）、石友三（1891-1940）、佟麟閣（1892-1937）、孫連仲（1893-1990）、劉汝明（1895-1974）及趙登禹（1898-1937）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陸士畢業生之發端最早，故後三者的創建中，陸士畢業生之參與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下筆者將就後三者分別析論之。

首先論述日本陸士畢業生對各省設立講武堂等軍事學校的參與情形。在清末建立的各級陸軍學堂中，[138]中國留學生常獲各省督撫重用而得以經辦其事，對清末軍事教育的建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以下筆者大致上以畢業的期別和兵科別來論述其重要者。限於篇幅，僅以前六期的主要畢業生做為考察對象。

第一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的陳其采，曾於長沙負責主辦湖南武備學堂，[139]並擔任總教習一職。同期同兵科的吳元澤（1874-1945），清末時曾任華中地區下級軍官的訓練中心——湖北防營將弁學堂堂長；[140]蔣雁行（1875-1941）則曾任北洋速成武備學堂提調（辦事官員），[141]和江北

138 清末的軍事教育體系大致上分為速成和正規兩種系統。前者如各地設立的武備學堂、保定的兵監學堂（如日本的戶山學校），及在保定的陸軍速成學堂（相當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程度較低者）。至於後者，光緒三十一年，練兵處和兵部會奏的〈陸軍學堂辦法〉中，取法日本的軍事教育體制，規定各級陸軍學堂分為修業年限三年的陸軍小學堂（每省各設一所，相當於日本的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修業年限二年的陸軍中學堂（共設四所，設於河北清河、陝西西安、湖北武昌、江蘇南京四地，相當於日本的中央幼年學校）、修業年限三年（入伍訓練一年、在校修習二年）的陸軍兵官學堂（全國僅設保定一所，相當於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修業年限三年的陸軍大學堂（本應設於京師，袁世凱將其前身——北洋軍官學堂設於保定，相當於日本的陸軍大學校）。參見東亞同文會，〈清國新式陸軍ノ評論〉，《東亞同文會報告》95 回，頁 45。

139 吳相湘，〈陳果夫久病成良相〉，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二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頁 138。

140 湖北防營將弁學堂的前身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成立的六營公所，由德國教習負責輪訓湖北各營之舊式軍官。光緒二十七年（1901）初始改名，並延聘日本教習水島米三郎（步兵少佐）等五人，負責輪訓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等五省的下級軍官。該學堂後於光緒三十年（1904）併入武高等學堂。參見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頁 254-255。

141 袁世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新曆三月上奏朝廷，擬將培訓新軍幹部的正規學堂分為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三等，共計修業年限為 12 年。然袁又認為：「中國風氣初開，根柢尚淺，中學、大學規模雖不可不備，而階級斷難以驟躋，只可從緩建立。為今之計，惟有趕緊興辦小學，以為造端之基。並擬別設速成學堂一區，以為救時之用。」以上引

臺灣政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督練公所總參議，民國三年（1914）特任將軍府靖威將軍，[142]並調任陸軍訓練總監。同期砲兵科畢業的劉邦驥，曾於光緒三十一年奉張之洞之命，仿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將武高等學堂（前為湖北防營將弁學堂）改為武師範學堂，並擔任堂長。劉又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立的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擔任監督，[143]民國成立後曾任北京高級警官學校校長。同期步兵科畢業的鐵忠（1873-1938），原名良，因避兵部尚書鐵良諱改名忠，亦曾擔任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監督。[144]同期騎兵科畢業的吳祿貞（1880-1911），則獲張之洞重用，擔任湖北防營將弁學堂總教習、湖北武普通中學堂和學務處會辦、營務處幫辦等職務。[145]

第三期騎兵科畢業的蔡鍔（1882-1916），曾應湖南巡撫端方之聘，擔任湖南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並兼武備（訓練士官）、兵目（訓練士兵）兩學堂的教官。[146]蔡又認定廣西的地理和民性可以為中國的「普魯士」，善加經營之，可作為中國富強的根據地。故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受廣西巡撫李經羲（1859-1925）之聘至桂林，就任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又兼隨營學堂總理官。直到宣統二年（1910）十一月蔡奉調至雲南為止，前後有五年餘的歲月均奉獻在廣西的軍事建設上。[147]

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的李根源（1879-1965），創立政學會，清末時亦

文中的速成學堂，亦即同年十月成立於保定的北洋速成武備學堂。詳參袁世凱，〈遵旨建立北洋陸軍武備學堂擬訂章程呈覽摺〉（1903 年 3 月 20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中冊，卷 23，頁 749-751。

142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中央軍政と各省配備狀態〉之「將軍府」條，《支那》6 卷 1 號（1915 年 1 月 1 日，東京），頁 35。

143 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的總辦由第一鎮統制（師長）張彪兼任，會辦為第二鎮統制黎元洪，並以劉邦驥任監督，防營將弁學堂畢業的白壽銘任提調。教習中除有聘自日、德兩國的教官 28 人外，亦有很多湖北出身的留日士官生及防營將弁學堂的畢業生。參見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頁 259。

144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頁 259。

145 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64。

146 吳天任，《蔡松坡將軍年譜》（臺北：國立編譯館，1989），頁 20。

147 吳相湘，〈「護國軍神」蔡松坡〉，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一冊，頁 3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後並升任講武堂總辦。[148]陸士第六期砲兵科畢業的李烈鈞，曾由李根源推薦擔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後由宣統元年（1909）升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任命為雲南陸軍小學堂總辦兼督練公所兵備處提調。[149]而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的閻錫山（1883-1960），曾任山西陸軍學校教官，後升任監督。[150]和閻同期同兵科畢業的崇恭，曾任奉天講武堂監督。

其次，日本陸士畢業生參與設置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情形。由於服務於保定軍校之陸士畢業生頗多，無法一一縷述，擬就校長的角度切入，因校長的辦學態度，攸關學校發展和校風興衰至鉅。

保定軍校前身為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新曆十月，北洋速成武備學堂成立於保定，初隸屬於光緒二十八年新曆六月成立的北洋軍政司教練處，由馮國璋以教練處總辦身分兼任該學堂督辦。[151]光緒三十二年新曆十一月，兵部和練兵處合併為陸軍部後，[152]該學堂亦更名為陸軍速成學堂，又稱陸軍協和速成學堂，或稱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被劃歸陸軍部管轄。[153]民國元年（1912）四月，《臨時約法》頒布後的第一屆內閣——唐紹儀（1862-1938）內閣成立，由段祺瑞擔任陸軍總長。段主持的陸軍部開始籌備前清之陸軍兵官學堂的規復工作，俾利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同年六月，陸軍部正式將陸軍兵官學堂更名為陸軍軍官學校，[154]於保定之北洋軍官學堂（正名為陸

148 吳相湘，〈李根源創立政學會〉，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三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296。

149 項立嶺，《李烈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15-16。

150 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頁 14。

151 同年十一月學堂督辦改為段祺瑞。學堂總辦先為鄭汝成（1862-1915），後改為趙理泰，監督為曲同豐。該學堂為二年制，共辦 3 期。參見張力雲，〈從北洋武備學堂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收入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 10。

152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3。

153 張力雲，〈從北洋武備學堂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收入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 10-13。

154 鄭志廷、張秋山等編著，《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大學後遷北京）的原址開辦，並由段的親信趙理泰出任第一任校長。陸軍軍官學校在軍事教育上的地位相當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位於「北京門戶、京漢路樞紐」上的保定，因此又通稱「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55]保定陸軍官校是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黃埔軍官學校創辦以前唯一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共辦了九期（1912-1923），培育出各兵科的基層軍官六千餘名。

民國元年十二月，陸士第三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的蔣方震（1882-1938），[156]繼趙理泰之後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到任後，首先刷新人事，以陸士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的張承禮（字耀廷）擔任教育長，陸士第八期步兵科王興文為步兵科長，陸士第九期騎兵科臧式毅（1884-1956）為騎兵教務長，陸士第五期砲兵科譚學夔（?-1916）為砲兵科長，陸士第三期工兵科虞克震為工兵科長，陸士第三期輜重兵科楊祖德（1880-1919）為輜重科教務長（後升任該校校長）。[157]由此可知，留日士官生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騎、砲、工、輜重等五大兵科之課程設計，皆有參與，所造成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繼蔣方震之後擔任保定軍校之第三任校長曲同豐（1873-1929），與

頁 210。

155 林德政，〈保定軍官學校之研究（1912-192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0），頁 18。

156 蔣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寧人。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 1965 年在臺復館首任院長蔣復璁（1898-1990）的叔父。在蔣復璁為其叔父編纂的《蔣百里先生全集》中，曾記載：「公以士官步兵科第一名畢業，復以績優而為冠軍。士官榜首例由日本天皇賜刀，日人引為殊榮，今由公奪魁，日人嫉之甚。故該校自第四期起，中日學生分別編隊，即豫防中國學生再奪錦標也。」參見蔣復璁，〈先叔百里公年表〉，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六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頁 24。以上說法，似有美化蔣百里的成績和窄化日人心胸之嫌。蓋日本陸士自招收中國留學生以來，除少數課程因涉及國防機密，禁止中國留學生聽講外，基本上大多數學科、術科課程，中國留學生和日本本國學生是一起上課，成績統計和排名則分開計算。關於此點，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只列中國留學生名次即可得知，亦即日本陸士第一至三期步兵科第一名的陳其采、舒清阿、蔣方震三人，乃是陸士的中國留學生隊中之第一名畢業生。

157 尹雪曼，《軍學權輿——蔣百里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頁 54-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同期同兵科，以第六名畢業。和蔣、曲二人同期同兵科第十四名畢業的賈德耀（1880-1940）及上述楊祖德，前後有四位日本陸士第三期畢業生擔任過該校校長。保定軍校歷任八位校長，[158]陸士第三期出身者即占其半，比例相當高。

日本陸士畢業生對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設立之參與方面，由於黃埔軍校創立時間（1924）較第一期留日士官生的回國服務時間（1901），以及保定軍校創立時間（1912）都要來得晚，因此黃埔軍校的教官除來自留日士官畢業生之外，還有許多保定軍校的畢業生。職是之故，黃埔軍校的教官中，留日士官生所占比例，自然無法和保定軍校中的留日士官生相比。而且黃埔軍校在設立過程中，因孫文（1866-1925）實行聯俄容共策略，蘇俄派遣的顧問亦出力不少，[159]相形之下，留日士官生在該校就更不活躍了。

茲按期別先後舉出其較重要者如下：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的胡謙（1882-1927），曾為黃埔軍校第一任教育長；第十期砲兵科王柏齡（1889-1942），曾擔任教授部主任；第十一期步兵科何應欽（1890-1987），曾擔任過總教官。

關於陸士畢業生的深造情形。二十世紀初年，軍事學突飛猛進，職業軍官乃有進修之必要。清廷除繼續獎掖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以培育初級幹部之外，亦注意到須同時培養高級幹部。故透過駐日使臣與日方協商，希望准許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進入日本的陸軍大學校深造，並派遣將校進入各專門學校學習。幾經交涉，終獲日方同意。此後清政府對於留日習武之事，採雙軌並行的政策：一則繼續選送學生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基礎軍事教育；二則選派陸軍將校赴陸軍戶山學校等各專門學校，學習更高深且更有系統的軍事教育。[160]

宣統二年（1910），清廷陸軍部派遣張承禮、楊廷溥、陳乾、梁廣

158 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 38。
15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38-539。
160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謙（1889-?）、王風清（1884-1935）、張斯**譽**（1885-1967）六人入陸軍戶山學校；[161]史久光（1885-1962）、譚學夔、曾繼梧（1878-1944）、吳和宣、張炳標、黃承恩到陸軍砲工學校；[162]汪鎬基（1870-1946）、陳模、盧香亭（1880-1948）入騎兵實施學校；陳毅（陳儀，1883-1950）、涂永、李實茂（1884-1967）則到野戰砲兵射擊學校。值得注意的是，若對照附表四來看，上述清廷派遣赴日學習各兵科之高等教育者，幾乎都是各期日本陸士的畢業生。不過正如黃福慶所指出，滿清覆亡後，這個在軍事學上力求精進的重要方針竟無人注意，選派隨之中斷，殊為可惜。民國以後，國家對留日士官畢業生既沒有在政策上提供定期深造機會，也沒有在制度上安排長期培訓計畫，他們只有靠一己之力，謀求前往日本陸軍大學校等高等軍事學府深造的機會。[163]如陳儀於民國六年（1917）赴日本陸軍大學校深造，並於兩年後成為該校中國留學生之第一期畢業生。

161 陸軍戶山學校的前身為明治六年（1873）六月成立的陸軍兵學寮戶山出張所，翌年二月始改為今名。校址位於東京牛込區戶山，係日本陸軍為研究步兵戰技（射擊、劍術、刺槍術）、步兵的攻守戰術、體育和體操，及為培育軍樂隊而設的軍校。參見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頁 44-45。

162 陸軍砲工學校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創校於東京牛込區若松町，係為了對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且下部隊滿一年的砲兵、工兵少尉，實施更高深軍事知識和使彼等習得更先進技術而設。參見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頁 45-46。

163 民國以後，畢業自日本陸軍軍官所嚮往之兵學深造的最高殿堂——陸軍大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只有 6 批。以下畢業年後的括弧內，乃第一名的畢業生姓名和該期畢業總人數。按時間先後，依序為 1919 年（覃師范等共 7 人）、1921 年（崔維堪等 9 人）、1924 年（楊杰等 4 人）、1927 年（高勝岳等 5 人）、1930 年（王俊等 6 人）、1933 年（林薰南等 4 人）。此外，滿洲國亦選派了三批，分別是 1933 年（王維藩 1 人）、1936 年（憲原等 3 人）、1938 年（赫慕俠等 10 人）。參照上法快男編，《陸軍大学校》，附錄第七〈外国陸軍将校学生卒業者名簿〉，無頁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留日士官生與清末民初南北政治勢力

（一）南方革命勢力之拉攏士官畢業生

本節以清末時留日士官生和革命勢力間的關係做為論述主軸。首先回顧清末時留日士官生進行之自發性革命行動的概要。第一期騎兵科畢業的吳祿貞，曾與同為張之洞保送入日本陸士的好友傅慈祥（1872-1900）等人，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東京組織了中國留日學生界的第一個親睦組織——勵志會，作為各省派赴留日的官費留學生聯絡感情、交換知識的場所。[164]後因對清政府的態度向背及政治立場的不同，勵志會漸分裂為穩健和激進兩派。前者以章宗祥（1879-1962）、曹汝霖、王璟芳（1876-1920）等為首，主張體制內的改革，立場漸與官方接近。後者除吳、傅之外，還有戢元丞、沈翔雲等人，主張排滿興漢，從事革命運動以救中國。[165]

吳祿貞與戢、沈三人曾走訪僑居日本的孫文，對孫所宣揚之排滿革命的理念頗為推崇。其中吳還曾加入興中會，並和傅、戢等回國參加唐才常（1867-1900）於漢口所發動的自立軍之役，但是此役失敗，唐、傅等人也為張之洞所殺。[166]此外，第六期畢業的閻錫山，曾在留日期間和同期的李烈鈞、程潛（1882-1968）等 28 人組織「鐵血丈夫團」，以便在留日士官生之間成立一純軍事同志的組織，擔負革命實施之責。[167]

為何留日武備留學生會前仆後繼的組織自發性革命行動？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的革命勢力，不論清末挑戰滿清政府，還是民初時對抗北洋政府，大半來自華中的湖南（如黃興領導的華興會）、浙江（如陶成章、蔡元培等領導的光復會），以及華南的廣東（如孫文領導的興中會）

164 趙宗頗、夏菊芳，《吳祿貞》，頁 12。
165 石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頁 68-69。
166 趙宗頗、夏菊芳，《吳祿貞》，頁 13-22。
167 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省分。光緒三十一年，上述三個團體在東京合組中國同盟會，即倒滿興漢之革命勢力的大集結。清末最早派遣留學生赴日習武的江浙、兩湖等地，本來就是革命勢力盛行之地，加上遠渡重洋出國的留學生，往往會參加留日同鄉會等組織以慰鄉愁，彼此間互通聲氣，使其原本在家鄉即萌芽的反滿思想，遂與當時流行在東京等海外各地的革命思想互相激盪。激進者甚至就如參加自立軍之役的吳祿貞等人一樣，直接回國投入革命行動。

留日士官生於留學東京期間加入同盟會者頗眾，其中較著名的，包括第三期步兵科許崇智（1886-1965）、第十期砲兵科張群（1889-1990）、第十一期砲兵科朱紹良（1891-1963）、第十一期砲兵科谷正倫（1889-1953）、第十一期輜重兵科賀耀組（1889-1961）等。

筆者在此嘗試解釋：為何清末民初的中國會引發南北相爭？關於南北對抗的說法很多，筆者擬就南北軍人之不同養成背景來加以探討。北方軍權掌握在直隸總督袁世凱手中，其大量派遣自軍中遴選的武備留學生赴日，不過獲選子弟幾乎都來自「革命勢力沙漠」的北方各省；再加上袁世凱長久以來灌輸子弟兵效忠朝廷及其個人的思想教育，以學成後的功名利祿來籠絡，故來自北方的武備留學生大多不會傾向革命。而江浙、兩湖、兩廣等地原即為革命勢力盛行之地，留學生素具反滿思想，又和海外各地的革命思想相結合，遂使南方成為革命勢力的大本營，也種下了南方革命勢力和北方保守勢力互別苗頭，終至引發南北對抗。

固然南北雙方皆有革命勢力，也都有保守勢力；再加上個人立場會隨著時勢境遇而有所變化，革命、保守容或無法如此簡單二分。筆者在此處的分析乃重視其比例原則，也就是以南方革命勢力和北方保守勢力為主要討論對象，暫不著眼於身為少數之南方保守勢力和北方革命勢力。李劍農曾謂：「自推倒滿清帝制以來，中國政治上的鬥爭，常常是革命派和軍閥官僚派對抗的鬥爭。……漢陽的激戰，表面上是革命軍和清軍鬥爭，實際上便是革命軍和北洋軍閥鬥爭的開始。」[168]誠哉斯言。

168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頁 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朝末年軍中人事之南方革命和北方保守兩派對立的結構性因素，竟成了民國以後南北對立、兵連禍結的原因之一。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畢業生，返國後除分布各省擔任軍事學校的教習外，不少人亦供職於中央機構的陸軍部或軍諮府，其中又以漢人居多。如第一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的陳其采，留日時加入興中會，回國後在湖南巡撫端方麾下擔任湖南新軍第五十標（團）首任統帶（團長），旋調任第四十九標統帶，期間曾暗中聯絡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陳後來出任軍諮處第三廳廳長。清末最高的軍令系統機構軍諮處，其時已為革命勢力所滲入。

革命勢力所滲入的，不只限於軍令系統，軍政系統的陸軍部也開始出現革命勢力。宣統元年（1909）十月，陸士第四期步兵科第三名畢業的蔣作賓（1884-1942），調任陸軍部軍衡司。袁世凱雖已於同年一月遭清廷罷黜，但北洋六鎮各級軍官幹部者仍為袁的心腹舊人。蔣深知滿洲親貴將北洋軍權收歸中央之渴望，便向陸軍部右侍郎（次長）蔭昌及左侍郎壽勳建議整編全國軍隊，期在五年內汰換原屬袁世凱所轄之北洋系高級軍官，代之以畢業歸國的留日士官生。[169]宣統三年（1911），蔣升任軍衡司司長，[170]他和第五期步兵科第七名畢業、時任軍制司蒐簡科科員的何成濬（1882-1961），均為潛伏在陸軍部內的革命黨人。

蔭昌、壽勳等當時正不遺餘力地集中軍權於朝廷，自然對蔣作賓的建議深表贊同。彼等讓蔣放手行事，起用陸士留學生中之佼佼者。如號稱「士官三傑」的第六鎮（直隸南苑）統制吳祿貞、第二十鎮（直隸灤州）統制張紹曾（1879-1928）、第二混成協（奉天）協統藍天蔚等三人，之所以能在北洋勢力雄厚的直隸和東北等地擔任統制（師長）、協統（旅長），實和蔣的運作安排有關。蔣希望透過滿族親貴來威壓袁系軍官，拓展革命勢力；滿族親貴則打算效其先祖於入關前後以漢制漢的故技，欲提拔士官系來抑制北洋系的發展。由此可知，滿族權貴及蔣作賓雙方

169 蔣作賓，《蔣作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 6-7。
170 張騰蛟，《使於四方——蔣作賓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頁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有盤算，然共同打倒目標都指向袁及其子弟兵。此一政策終歸失敗之原因有二，一因人事布置不敵北洋軍系根深柢固的實力；[171]二因時機尚未成熟，而武昌事起，遂給了蟄居中的袁世凱東山再起的機會。

（二）袁世凱之利用留日士官生

甲午戰後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廷任命袁世凱擔任新建陸軍督辦，接管長蘆鹽運使胡燏棻（1840-1906）所招募之洋槍隊「定武軍」5,000 人。[172]袁奉命後旋赴位於天津東南七十里的小站，將定武軍改編為新建陸軍，[173]正式肩負起為清廷建立一支新式武力的重任。小站練兵的資歷，此後成為袁在清末民初政壇叱咤風雲的基礎。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獲得東山再起的機會。清廷授袁為湖廣總督，旋又任命他為欽差大臣。袁以江蘇將軍馮國璋的第一軍和段祺瑞的第二軍南攻武漢三鎮，並藉此優勢武力擊敗新興的革命勢力。二次革命時，袁復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兼國務總理，[174]在後方負責調兵遣將；又以馮國璋任江淮宣撫使兼北洋第二軍軍長，南下鎮壓，馮並於民國二年（1913）九月攻下南京後，出任江蘇都督（後改稱將軍，袁死後改稱督軍）。

段祺瑞和馮國璋久為北洋派兩大柱石，均有功高震主之勢，故老謀深算的袁深怕禍起蕭牆，早懷猜忌之心，決定預作部署以防範之。袁就任大總統後，第一步便是援引《臨時約法》第二十三條之「大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全國陸海軍」的規定，[175]自任為陸海軍大元帥。並於民國三年五月八日在大總統府內設置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176]以分

171 李宗一，《袁世凱傳》，頁 158。

172 劉鳳翰，《新建陸軍》（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頁 45-47。

173 李宗一，《袁世凱傳》，頁 47-48。

174 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5。

175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中央軍政と各省配備狀態〉之「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條，《支那》6 卷 1 號（1915 年 1 月 1 日，東京），頁 34。

176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支那民國三年大事記〉，《支那》6 卷 3 號（1915 年 2 月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段祺瑞所掌控的陸軍部之權。接著袁授馮以虛名的參謀總長，擬伺機奪去其江蘇地盤。[177]

袁既要和羽翼漸豐之北洋派昔日舊屬袍澤對抗，便想要拉攏久和北洋派處於對立之勢的留日士官派。清末時鐵良、良弼便是拉攏留日士官派以對抗袁之北洋派的始作俑者。如今時移勢變，輪到袁要拉攏士官生，以制衡自家功高震主的北洋派。袁之設置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係為效法清廷於宣統三年設置軍諮府（民國以後的參謀本部）的作法，皆為將軍權自陸軍部手中收歸中央，使軍政（陸、海軍部）和軍令（參謀本部）兩系統皆納入掌控。茲將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的組織架構和高級職員姓名臚列如下：

（一）辦事員（原則上七人）：參謀總長馮國璋、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總務廳長唐在禮（以上四人為當然成員），以及蔭昌、薩鎮冰、王士珍（以上三人為大元帥特派之高級軍官）

（二）總務廳長：唐在禮

（三）辦事處下設三個所

第一所主任：蔣廷梓

第二所主任：田書年

第三所主任：童煥文

（四）軍事參議官：姚寶來、程璧光、覃師范、張一爵、蔣方震、陳儀、姚鴻法、唐寶潮[178]

統率辦事處可說是袁貫徹其個人軍事獨裁的機構，這點從參謀總長、陸軍總長、海軍總長和袁特派之高級軍官等要職，皆僅名為「辦事員」可以窺知。袁於此一機構中，將北洋三傑（王、段、馮）、前清陸

日，東京），頁 33。

17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40。

178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中央軍政と各省配備狀態〉之「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條，《支那》6 卷 1 號，頁 34-3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上冊，頁 112-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勢力（應）、海軍勢力（劉、薩）悉數網羅，並提拔日本陸士第一期砲兵科畢業的唐在禮（1880-1964）為總務廳長。唐既出掌總務廳，便大量起用其陸士學弟，如三所主任蔣廷梓、田書年及童煥文皆為陸士第三期砲兵科畢業。至於八名軍事參議官中，有四人是留日士官生出身，即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的覃師范（1880-1944）、第三期步兵科畢業的蔣方震、第五期砲兵科畢業的陳儀，及第三期工兵科畢業的姚鴻法。袁在其軍事獨裁機構中起用唐在禮，並透過唐重用留日士官生，可說是不大信任其北洋派故舊的具體表現。

此外，袁世凱又於統率辦事處之下設置將軍府，授予八人將軍的封號。茲將其成員名錄列舉如下：

府長　建威上將軍　段祺瑞（正式官銜：管理將軍府事務）
　　成威上將軍　應昌
　　昭威將軍　蔡鍔
　　宣威將軍　蔣尊簋
　　綏威將軍　那彥圖
遙領　靖威將軍　蔣雁行
　　宏威將軍　丁槐
　　義威將軍　孫武[179]
參軍　龍裕光、韓鳳樓、鍾鼎基、蔡森、黃培松、陳廷訓

將軍府的將軍為有名無實的閒職，位尊而無實權，設置目的是為了使鼎革之際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都督交出兵權；具體作法是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將軍名號，命其督理軍務，作為中央的臨時派遣官。袁借重身兼陸軍總長的段祺瑞來管理將軍府，以制衡諸將軍，俾達中央遙控地方軍權的目的。而八名將軍中有三人是留日士官生，即原任雲南都督、第三期騎兵科畢業的蔡鍔；原任浙江都督、同期同兵科畢業的蔣尊簋

179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中央軍政と各省配備狀態〉之「將軍府」條，《支那》6 卷 1 號，頁 3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上冊，頁 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82-1931）；[180]及原任江北護軍使、第一期步兵科畢業的蔣雁行（1875-1941）。辛亥鼎革之際，留日士官生在各省所發揮的領導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將軍府的參軍中則有兩人畢業自陸士，即第六期工兵科畢業的韓鳳樓（?-1956），及同期砲兵科畢業的鍾鼎基（1879-1938）。

袁又在北洋軍之外另行編組模範團，由其本人和長子袁克定（1878-1958）先後出任團長，此舉無疑又為清末載濤、毓朗等編練禁衛軍的翻版。當時「專司訓練近衛軍大臣」一職規定由王公、大臣監充之，[181]清廷授命載濤、毓朗擔任。載、毓兩人除負責編練禁衛軍，還一同擔任管理軍諮處事務，獨攬宮禁和全國軍權。兩相比照之下，袁的作法和載濤、毓朗獨攬軍權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相對於清政府努力集中軍權於軍諮府，袁底下的參謀本部顯然是個有名無實的機構，這點從袁授馮國璋任參謀總長一事即可看出。

（三）段祺瑞之重用留日士官生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段畢業自天津的北洋武備學堂（1885-1900），光緒十五年（1889）獲選為赴德國學習砲兵的公費留學生，深造兩年後，轉赴克魯伯（Krupp）兵工廠實習。[182]袁所屬的北洋系諸將，基本上和革命勢力所容易滲透的留日士官生在政治立場上敵對，身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的段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就民初軍閥的國際背景來看，

180 蔣尊簋，字伯器，浙江諸暨人。浙江餘杭出身的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曾稱譽蔣尊簋和蔣方震（浙江海寧出身）二人曰：「浙江二蔣，傾國傾城。」時人又將此二蔣和湖南寶慶出身的蔡鍔並稱「南方三傑」。參見蔣復璁編，〈先叔百里公年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六輯，頁 23；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蔣伯器行狀〉，《革命先烈先進傳》（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頁 930。

181 東亞同文會，〈清國樞要大官表〉，《東亞同文會報告》122 回（1910 年 1 月 15 日，東京），附錄頁 1。

182 季宇，《段祺瑞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頁 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是皖系的主要支持者，而皖系基本立場亦以親日著稱。皖系在參戰軍（邊防軍）中起用大批留日士官生的緣由，當從段擔任國務總理時，與日本首相寺內正毅（1852-1919）加強雙方合作關係一事談起。

民國五年（1916）六月袁世凱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為總統，然政府實權卻操縱在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北洋陸軍出身的段，和湖北陸軍出身的黎，可謂先天上繼承了袁世凱和張之洞兩人在新政、練兵等施政上互別苗頭的傳統。如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新式陸軍野戰演習——彰德秋操，其設定便是北洋陸軍和湖北陸軍所進行的北攻南守對抗。民國六年（1917）春夏間，黎、段兩人為了是否參加歐戰的問題而傾軋愈烈，史稱「（總統）府（國務）院之爭」，黎總統主和而段總理主戰。段為通過參戰案，唆使督軍團對國會施壓，黎則將段免職。爾後段的心腹徐樹錚（1880-1925）為其導演了張勳復辟、國會解散、馬廠誓師等重頭戲，並成功拉下黎元洪，由馮國璋繼任大總統，黎於下野前復任段為國務總理。段再度掌權後所發出的第一道命令，便是於民國六年八月對德宣戰。[183]

民國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即中國對德、奧宣戰四個月後，段祺瑞奉大總統馮國璋之令，出任督辦參戰事務一職。[184]根據這項任命，段於民國七年（1918）三月一日組織督辦參戰事務處，負責統籌參戰事宜。翌日，段致電各省督軍、省長，電文曰：「嗣後凡關參戰事件，請即隨時與本處接洽。外患方殷，軍事吃緊，并望劻勷，俾資進行。」[185]同年九月，參戰軍督練處成立，由段指派靳雲鵬（1877-1951）督理參戰軍訓練

183 曹汝霖，〈兼長交通財政兩部的回憶〉，收入賈士毅著，《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頁 99。

184 〈大總統特派段祺瑞為督辦參戰事務令〉（1917 年 12 月 19 日，政府公報第 692 號），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上冊，頁 735-736。

185 〈段祺瑞組成督辦參戰事務處通電稿〉（1918 年 3 月 2 日，北洋政府督辦參戰事務處檔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上冊，頁 719-7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宜。[186]

靳雲鵬號稱是段手下的四大天王之一，也是這四人中唯一不是出身日本陸士者。其餘三人是第七期步兵科畢業的徐樹錚、第三期砲兵科吳光新（1875-1939），和與吳同期同兵科的傅良佐（1873-1924）。從段之心腹人事背景來看，或可幫助吾人了解皖系親日色彩濃厚之基本原因。段為擴張皖系勢力以抗直系和南方革命勢力，謀求和日本打好關係，故重用留日士官派，然彼等在職務上的表現相去甚遠。徐樹錚才華洋溢、膽識過人；然傅良佐的入湘、吳光新的入川卻都敗於南方軍之手。

由於段在張勳失敗後，仍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重開國會，因此孫文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以為對抗。對於南方叛離的問題，段主戰而馮主和，此亦為直皖兩系心生芥蒂的開始。[187]段為與親英、美兩國的直系抗衡，也為籌措對南方用兵的軍費，以遂行被譏為「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之武力統一政策，[188]其自民國六年至七年的兩年間，向日本寺內內閣洽商所取得的西原借款，據估計高達三億六千萬日圓。這筆鉅款雖有三分之一用在償還內外債、交通銀行的財政整理，及電信和鐵路建設等實業用途，但其餘三分之二則為段使用於對南方用兵的軍費支出。[189]

然而段的武力統一政策，終因內有馮國璋等直系掣肘，外逢南方諸軍抵抗而宣告失敗。段有感於北洋軍隊日益私兵化且不聽中央指揮，便接受徐樹錚建議，另行編組一支可稱為「國軍」的武力。為此段和日本加強合作，聘請日本軍事顧問、教官協助訓練參戰軍，[190]以南苑和北苑

186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參戰軍督練處を設立す〉，《支那》9 卷 19 號（1918 年 10 月 1 日，東京），頁 45。

187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 134。

18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64。

189 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臺北：三民書局，1979），頁 517。

190 曾於清末擔任袁世凱之軍事顧問，協助擘劃河間、彰德秋操的坂西利八郎，此時以大總統軍事顧問的身分兼參戰軍首席訓練顧問，帶領一批日本軍事教官協助編練參戰軍。詳參東亞同文會編，《続対支回顧録》下卷，頁 8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練兵場，並於黃寺設置講武堂訓練士官。[191]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三個師和四個混成旅，共約 6 萬人的兵力，[192]其全部軍械、裝備皆基於〈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規定，由日方供應。[193]

北洋軍閥的皖系和日本軍方關係頗深，除了從段的重用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等留日士官生，及聘用日籍軍事教官以協助訓練參戰軍等事例可得到佐證外，就皖系所屬部隊及參戰軍帶兵主官多為陸士出身來看更是明顯。如皖系所屬的第五師師長張樹元（1879-1934），為陸士第三期砲兵科畢業；第十五師師長劉詢，為陸士同期步兵科的畢業生。

歐戰結束後，民國八年（1919）八月，參戰軍更名，[194]三個師更名為邊防軍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由擔任督辦邊防事務一職的段祺瑞自行統領；四個混成旅更名為西北邊防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歸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節制。[195]邊防軍共有三個師，除駐防山東之第二師師長馬良（1875-1947）外，駐防近畿的第一師師長曲同豐與第三師師長陳文運（1880-?）皆為陸士第三期畢業生。此外，第一師旅長苑尚品（1880-?）為同期騎兵科畢業生，第三師旅長張濟元為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生。

西北邊防軍共有四個混成旅，第一、第四兩旅駐洛陽；第二旅駐廊坊；第三旅駐宣化。此四旅羅致青年軍官，訓練尤精。[196]徐樹錚曾於民

191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 138。

192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92），頁 231。

193 〈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簽署於民國七年（1918）五月十六日，由日方之陸軍軍事協約委員長齋藤季治郎（1867-1921），和陸軍軍事協商委員長靳雲鵬於北京簽署。關於其全部條文，詳參〔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東京：財團法人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上卷，頁 441-443。

194 〈曲同豐關於參戰軍改稱邊防軍啟用新關防公函〉（1919 年 9 月 3 日，北京政府邊防軍第三師檔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上冊，頁 732-733。

195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61。

196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二編：軍史，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八年十月，親率第三混成旅入外蒙，迫使外蒙政府取消自治。[197]四名旅長中除曾隨徐前往外蒙交涉之第三旅旅長褚其祥外，其餘皆為留日士官生，即第一旅旅長宋邦翰（1880-1960，第七期騎兵科畢業）、第二旅旅長宋子揚（第七期砲兵科畢業）、第四旅旅長張鼎勳（第七期步兵科畢業）。留日士官生擔任邊防軍要職，足證皖系軍隊深受日式軍事訓練的影響。

（四）張作霖之重用留日士官生

張作霖出身關外的綠林馬賊，光緒二十八年（1902）始受盛京將軍增祺（1851-1919）招撫，擔任清朝地方官軍的營官。民國七年九月，官拜東三省巡閱使。[198]民國八年七月，張又在日本的幫助之下，以武力迫使反對派的吉林督軍孟恩遠（1856-1933）去職，並示意北京政府調原黑龍江督軍孫烈臣（1872-1924）接任吉林督軍，然後再以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陞（1863-1928）升任黑龍江督軍。[199]自此張成為主宰東三省近十年的最高權力者，被擁護為奉系首領，號稱「東北王」、「滿洲王」。另一方面，日本在直皖戰後因其所支持的皖系失勢，乃積極扶助奉系，以對抗英、美所力挺的直系，俾確保日本在東北的特殊權益。[200]

民國十一年（1922），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遭吳佩孚（1874-1939）擊敗，退回關外後，為了雪恥圖強，於同年七月底成立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作為汰弱留強、整軍經武的最高執行機構。該機構由張的心腹孫烈臣任統監，曾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首任堂長的張作相（1881-1949），和陸士第五期工兵科畢業的姜登選（1882-1925）擔任副監，其長子張學良（1901-2001）則出任參謀長。[201]

197 王彥民，《徐樹錚傳》，頁 201-209。

198 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頁 84。

199 惠德安，《張學良將軍戎幕見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頁 5。

200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頁 240。

201 民國十三年（1924）五月下旬孫烈臣病逝後，張作霖自兼統監。翌年該機構改稱陸軍整訓處，張學良升任三位副監之一（另兩位為姜登選、韓麟春），參謀長一職由臧式毅接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對於出身行伍，跟著張作霖一起發跡的舊派將領，受過新式軍事學校教育的為新派將領，其中又可分為士官派和講武堂派。新派中之士官派，以陸士第八期砲兵科畢業的楊宇霆（1885-1929）為首，[202]楊曾任張作霖的總參議和參謀長，頗受重用，得勢後拉攏陸士學長姜登選和第六期砲兵科畢業的學長韓麟春（1885-1929）等自成一派。講武堂派則是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的戰術教官郭松齡（1883-1925）為首。郭拉攏其在講武堂的學生張學良，再糾合講武堂受訓學員自成一派。[203]

由以上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成員來看，新、舊兩派都有，不過實際負責的是新派的姜登選、北京陸軍大學畢業的郭松齡和張學良。[204]這批新派將領可說是讓奉軍脫胎換骨，[205]得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擊敗直系、湔雪前恥的核心人物。

日後張學良不諱言士官派就是日本派，而講武堂派就是中國派。[206]爾後兩派傾軋愈烈，終導致姜登選於民國十四年（1925 年）十一月遭郭松齡槍殺。而郭松齡後來之所以倒戈反張，原因之一便是不滿楊宇霆惡意排擠。同年十二月，郭叛變未成，兵敗身死後，楊宇霆甚喜，而和郭有師生情誼的少帥張學良則是恨楊愈甚。民國十八年（1929）一月十日，楊宇霆遂為張學良槍殺。[207]

東北軍中士官派和講武堂派兩派傾軋的結果，導致兩敗俱傷。士官派姜登選、楊宇霆先後遭講武堂派槍殺，講武堂派郭松齡叛變身亡，碩果僅存的士官派健將韓麟春，病逝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連串東北軍

替。參見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頁 84。

202 楊宇霆在各種留日士官生名簿的記載上名為玉亭，其後方改名宇霆。參見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頁 712。

203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頁 16。

204 陳崇橋、胡玉海、胡毓崢編著，《從草莽英雄到大元帥——張作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163。

205 司馬桑敦，《張老帥與張少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頁 85-89。

206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頁 159。

207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頁 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內訌鬥爭、彼此仇殺的結果，無疑大大削弱了日後和日軍周旋的實力。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中顯然已缺乏知悉日情的留日士官派大將坐鎮指揮，遂令整體戰力受到影響，東北三省也因此成為昭和時期日本陸軍推動大陸政策下的頭號戰利品。

東北軍士官派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這三位要角，雖於四年間先後凋零，但不可否認的是，張作霖之重用彼等整軍經武的結果，不但提升了東北軍的戰鬥力，也強化了張個人問鼎中原的資本。

五、結語

中國武備留學生前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學，自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當時西力東漸，東亞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等立國要素漸次受到威脅，然絕大多數有色人種國家均感束手無策。日本先是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擊敗中國，改寫了東亞世界的國際權力版圖；然後在日俄戰爭中，又創下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紀錄，為世界近代史上絕無僅有，日本亦因此成功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凡此種種，均成為中國朝野人士在各方面以日為師的原因，而軍事教育方面自然也不例外。日本的東亞同盟論者，如「官方的人種同盟論」之主要代表人物川上操六，派遣屬下武官往訪清廷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劉坤一等，希望中、日共同合作對抗歐、美的侵凌。張、劉等主張以日為師者，遂決定派遣武備留學生赴日學習，俾利救亡圖存。雖然當時中國和日本兩方各有盤算，但大體上這個制度對兩國而言都算成功——日本成功擴張其軍事影響力於中國；中國則是近代軍事教育漸不需假手他人。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在近代中國軍事、政治史或近代中日交流史、外交史等研究上，皆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中國武備留學生先於成城學校或振武學校接受預備軍事教育，然後在日本陸士接受正式軍事教育，學成歸國後，除清末時多在軍界服務外，民國後不少人亦跨足政界乃至金融界等。不少近代中國的軍政名人，都可在此〈日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中找到，當中有滿清權貴倚為干城者，亦有東渡留日時即已加入中國同盟會者。民國成立後，留日士官生亦各擁其主，多數參加南方革命或護法勢力和北洋政府對抗；但也有少數自始即和革命黨絕緣，自清亡後便選擇效忠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等北洋勢力。在往後的中日戰爭或國共內戰中，留日士官生亦各自選邊站，因個人思想、認同的歧異而分別選擇和日本政府、國民政府或中共政府合作。

留日士官生對於清末中國的軍事近代化，可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建立過程中，均可看到留日士官生的活躍身影。前者表現在清末新軍之各鎮、協參謀多由留日士官生出任；而後者則是表現在清末滿清權貴致力將軍權收歸中央所有。滿清權貴在新成立的軍令系統機構——軍諮處中，大舉提拔留日士官生，主要目的便是收回久處袁世凱勢力範圍下的北洋六鎮軍權。

在日俄戰爭後連續兩年舉行之河間秋操和彰德秋操等秋季野戰演習中，留學日本陸士的畢業生亦多受到重用，並逐漸嶄露頭角。而兩次秋操之所以能夠順利舉行，和當時的中、日關係處於近代兩國親善關係之最頂點的狀況息息相關，除有許多留日士官生積極參與，當時服務於袁世凱帳前的日籍軍事顧問團亦擘畫經營，出力不少。兩次秋操甚為成功，但掌握六鎮雄兵的袁世凱卻因而受到滿族親貴猜忌。袁為明哲保身，乃於彰德秋操結束後不久，將三分之二的北洋兵力歸建陸軍部直轄。

培養近代中國軍事人才的四大來源中，成立最早的即為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制度。職是之故，清末各省的講武堂等各種軍事學校、民初成立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國共合作產物——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者成立時所聘任的師資，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仰賴留日士官生。學成歸國的彼等漸次投入近代中國軍事教育前線，不論是對清末民初近代軍事教育的永續經營，或是在國家求生存發展之獨立自主性的確保等方面，均有頗大貢獻。

清末兵部尚書鐵良力求集中軍權於中央政府，因此極力拔擢陸士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業的滿人幹才良弼，並接受其建議，起用日本陸士畢業生來掌管陸軍部和軍諮處的重要軍務，俾利打破袁世凱所壟斷的北洋軍權。但這也加深了北洋派和留日士官派的對立，其影響甚至在辛亥革命及南北對立的史實中，均見端倪。

南方革命勢力自清末起即注意拉攏留日士官生，但在和滿清與北洋政府的對抗中卻一再失利。清末滿族權貴亦曾利用留日士官派，以圖制衡袁世凱，亦告失敗。民國以後袁世凱設立統率辦事處，希望以留日士官派來壓制段祺瑞、馮國璋等耆宿名將，仍不成功。段祺瑞在其心腹將領及參戰軍（邊防軍）的隊職官等方面重用留日士官派，以圖抗衡親英、美的直系和南方的護法政府，同樣未如願。張作霖在東三省陸軍整理處起用留日士官生整軍經武，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獲勝，但也使得東北陸軍墜入士官派和講武堂派相互鬥爭的惡性循環中。

*本文承蒙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100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下之研究總計畫「臺灣與世界的對話」下之子計畫「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的補助與支持，謹致謝忱。本文作者並感謝匿名審查教授所提供之寶貴意見與修正建議，及本校法律系畢業校友于翔麟、陳昌栩兩位先生的熱心建言，特此致謝，惟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責任編輯：蘇聖雄　校對：楊曉宜　蘇婉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　黃福慶所統計清末中國武備留學生入聯隊服役、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一至十期）及自該校第一至十期畢業人數

	入聯隊服役人數	入士官學校人數	士官學校畢業人數（含第九期退學數）
第一期	40	40	39
第二期	25	25	25
第三期	95	95	92
第四期	90	84	75
第五期	60	58	57
第六期	204	198	197
第七期	55	55	53
第八期	55	54	54
第九期（因辛亥革命故全員被迫退學）	48	47	47
第十期	55	34	34
合　計	727	690	673

資料來源：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9。

說　　明：本表係黃福慶根據王隆中重刊，〈留東陸軍士官學校同學錄〉製作而成。據黃氏所言，該同學錄和興亞院編，《日本留學中華民國人名調》，頁 639-669 相較，兩份資料所刊人數頗有出入，黃氏暫以前者為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　郭榮生所統計清末中國武備留學生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一至十一期）之入學時間、畢業時間及第一至十一期畢業人數

	入學時間	畢業時間	士官學校畢業人數 （含第九期退學人數）
第一期	1900 年 12 月	1901 年 11 月	41
第二期	1901 年 12 月	1902 年 11 月	25
第三期	1903 年 12 月	1904 年 11 月	96
第四期	1906 年 12 月	1908 年　5 月	83
第五期	1907 年　7 月	1908 年 11 月	66
第六期	1907 年 12 月	1908 年 11 月	205
第七期	1908 年 11 月	1910 年　5 月	55
第八期	1909 年 12 月	1911 年　5 月	55
第九期	1910 年 12 月	1911 年 11 月 退學（因辛亥革命）	39
第十期	1914 年　2 月	1915 年　5 月	35
第十一期	1914 年 12 月	1916 年　5 月	19
至第十期為止合計			700
至第十一期為止合計			719

資料來源：郭榮生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 1-62、153-159。

說　　明：根據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印、郭榮生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之第一至第十一期名簿，和該書表一，〈本書漏列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各期學生名錄〉之第一至第十一期的漏列者名錄，筆者將兩份資料的人數相加後所得出之畢業人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三　田久川所統計清末中國武備留學生的陸軍士官學校（第一至十一期）的入學時間、畢業時間、修業年限、兵科別畢業人數及第一至九期畢業人數

期別	入學年月	畢業年月	修業年限	步兵	騎兵	砲兵	工兵	輜重兵	各期畢業人數
第一期	1900 年 6 月	1901 年 11 月	一年半	22	4	9	5	0	40
第二期	1901 年 6 月	1902 年 11 月	一年半	16	2	4	3	0	25
第三期	1903 年 6 月	1904 年 11 月	一年半	51	12	12	16	4	95
第四期	1906 年 6 月	1908 年 11 月	二年半	37	14	20	9	3	83
第五期	1907 年 1 月	1908 年 11 月	二年	23	8	11	12	4	58
第六期	1907 年 6 月	1908 年 11 月	一年半	111	23	40	17	8	199
第七期	1908 年 4 月	1910 年　5 月	二年	28	10	12	5	0	55
第八期	1909 年 6 月	1911 年　5 月	二年	28	10	12	5	0	55
第九期	1910 年 6 月	1911 年 11 月	一年半	29	6	1	1	0	37
第十期	1913 年 6 月	1915 年　5 月	二年	13	18	2	3	0	36
第十一期	1914 年 6 月	1916 年　5 月	二年	6	3	8	0	2	19
合計				364	110	131	76	21	702

資料來源：〔日〕田久川，〈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該校中國留學生〉，收入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編，《中日關係史論叢》第一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頁 214。

說　　明：田久川該表，係根據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補遺本》的相關資料編製而成。原表共列有二十九期，筆者只取其中之第一至十一期的部分加以統計、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四　筆者自製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至十一期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之陸士入學時間、兵科別畢業人數、兵科別代表人物及其兵科別畢業名次、各期畢業人數

	陸士入學時間	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騎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砲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輜重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各期畢業人數
第一期	1901 年 10 月	22 人 陳其采(1) 吳錫永(2) 吳茂節(4) 吳元澤(6) 鐵　良(改名鐵忠，8) 蕭星垣(11) 舒厚德(12) 蔣雁行(15) 吳紹璘(19) 段蘭芳(22)	3 人 王廷楨(1) 吳祿貞(2)	9 人 盧靜遠(1) 唐在禮(2) 陸　錦(3) 張紹曾(4) 許葆英(5) 劉邦驥(7)	5 人 章遹駿(1) 賈賓卿(2) 徐方謙(5)	0 人	39 人
第二期	1902 年 10 月	12 人 舒清阿(1) 哈漢章(2) 良　弼(3) 馮耿光(5)	2 人 蔣肇鑑(2)	4 人 王遇甲(2) 沈尚濂(3)	3 人 藍天蔚(2) 易迺謙(3)	0 人	25 人
第三期	1904 年 10 月	35 人 蔣方震(1) 許崇智(3) 曲同豐(6) 岳開先(9) 盧金山(13) 賈德耀(14) 劉　詢(15) 潘矩楹(17)	11 人 蔣尊簋(2) 蔡　鍔(3) 陳文運(4) 苑尚品(8)	27 人 章亮元(1) 周家樹(4) 吳光新(8) 張樹元(9) 傅良佐(11) 童煥文(13) 管雲臣(14) 田書年(19) 蔣廷梓(20)	15 人 張孝準(1) 姚鴻法(4) 虞克震(12)	4 人 楊祖德(2)	92 人
第四期	1907 年 12 月	33 人 張承禮(1) 蔣作賓(3)	11 人 黎本唐(7)	19 人 史久光(9) 曾繼梧(13)	9 人 劉繩武(6)	2 人 蕭鴻陞(2)	74 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士入學時間	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騎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砲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輜重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各期畢業人數
		石星川(6) 覃師范(12) 金永炎(14) 張斯麐(25) 王家駒(26) 田應詔(32)					
第五期	1908 年 10 月	23 人 沈同午(2) 王風清(3) 何成濬(7) 陳　乾(10) 夏占奎(15)	7 人 汪鎬基(2)	11 人 譚學夔(1) 陳　毅(改名陳儀，3) 涂　永(6) 李實茂(9) 沈汪度(11)	12 人 吳和宣(2) 姜登選(4) 張炳標(5)	4 人 高兆奎(3)	57 人
第六期	1908 年 11 月	110 人 王肇基(6) 楊廷溥(7) 胡　謙(9) 孫傳芳(19) 張濟元(26) 李根源(28) 梁廣謙(31) 丁慕韓(32) 尹昌儀(改名尹昌衡，33) 劉存厚(36) 胡學伸(43) 歐陽武(59) 崇　恭(80) 閻錫山(81) 仇式匡(97)	23 人 陳　模(12) 盧香亭(15) 張鳳翮(16) 顧品珍(21)	39 人 韓麟春(6) 周蔭人(17) 唐繼堯(20) 趙恒惕(27) 鍾鼎基(28) 李烈鈞(31) 程　潛(32)	17 人 黃承恩(改名黃慕松，1) 韓鳳樓(2)	8 人 蕭祖康(1)	197 人
第七期	1908 年 12 月	26 人 (不含退學者 2 人) 張鼎勳(14)	10 人 宋邦翰(9)	12 人 宋子揚(10)	5 人 程恒式(4)	0 人	53 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士入學時間	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騎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砲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工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輜重兵科畢業人數、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畢業名次	各期畢業人數
		陸光熙(15) 徐樹錚(20)					
第八期	1909 年 12 月	28 人 張輝瓚(2) 張煥相(4) 路孝忱(8) 王之藩(改名王樹常，9) 王興文(16)	10 人 熙　洽(5)	11 人 張修敬(1) 楊玉亭(改名楊宇霆，7)	5 人 夏尊武(3)	0 人	54 人
第九期	1910 年 11 月	29 人 宋鶴庚(4)	6 人 臧式毅(4)	1 人 齊寶賢(1)	1 人 白寶瑛(1)	0 人	37 人
第十期	1914 年 2 月	12 人 (不含退學者 1 人) 黃秉衡(2)	9 人 (不含退學者 1 人) 林振雄(5)	8 人 王柏齡(3) 張　群(4)	3 人 周元哲(3)	0 人	32 人
第十一期	1914 年 12 月	6 人 何應欽(2)	3 人 詹振黃(2)	6 人 朱紹良(1) 谷正倫(5)	2 人 楊澄源(1) 李毓華(2)	2 人 賀耀組(原名耀祖，1)	19 人
至第十期為止合計		334 人	92 人	141 人	75 人	18 人	660 人
至第十一期為止合計		340 人	95 人	147 人	77 人	20 人	679 人

資料來源：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第四回，頁 706-713。

說　　明：1. 畢業人數含第九期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全員退學者。

2. 人名後括弧內之阿拉伯數字為其兵科別畢業名次，更名者列於其新名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五　清末新軍、民國陸軍及日本陸軍編制

清末新軍編制	民初陸軍編制	日本陸軍編制
（正都統有功者賜以大將軍或將軍封號）	軍團 （軍團長；上將）	方面軍 （軍司令官；大將）
軍 （總統官；正都統秩視提督）	軍 （軍長；上將）	軍 （軍司令官；大將）
鎮 （統制官；副都統秩視總兵）	師 （師長；中將）	師團 （師團長；中將）
協 （統領官；協都統秩視副將）	旅 （旅長；少將）	旅團 （旅團長；少將）
標 （統帶官；正參領秩視參將）	團 （團長；上校）	聯隊 （聯隊長；大佐）
（教練官；副參領秩視游擊）	（團附；中校）	（聯隊副長；中佐）
營 （管帶官；協參領秩視都司）	營 （營長；少校）	大隊 （大隊長；少佐）
隊 （隊官；正軍校秩視守備）	連 （連長；上尉）	中隊 （中隊長；大尉）
排 （排長；副軍校秩視千總）	排 （排長；中、少尉）	小隊 （小隊長；中、少尉）
（司務長；協軍校秩視把總）	（司務長；少、准尉）	（特務曹長；准尉）
棚 （棚長；頭目）	班 （班長；上士）	分隊 （分隊長；曹長）
（正目、副目）	（中士、下士）	（軍曹、伍長）
（正兵；副兵；學兵）	（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資料來源：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頁 44-45；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纂，《北京誌》（1908 年 12 月 30 日發行），第十四章〈清國軍制の大綱〉。

說　　明：括號內為軍職；軍階。此表為清末新軍、民初陸軍、日本陸軍等三支部隊的軍官（如民初陸軍的上將——少尉）、士官（如民初陸軍的上士——下士）的軍職（如民初陸軍的師長）、軍階（如民初陸軍的中將）間之大致對照關係。此三支部隊的軍官、士官之軍職、軍階在某些細部上仍有差異，並非完全可互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宣統政紀實錄》第一冊。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清朝陸軍部（兵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三輯：軍事一》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天津：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1987。

王彥威纂輯，王亮編，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張之洞撰，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清國駐屯軍司令部編纂，《北京誌》，1908 年 12 月 30 日發行。

馮明珠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稿本專輯——志》。臺北：沉香亭企業社，2009。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1。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42 冊（卷 470，列傳 257）。北京：中華書局，1977。

〔日〕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ers.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簡稱 JACAR），Ref.B05016222300（第 1 畫像目），外務省記錄，H 門東方文化事業，7 類資料，雜集第二卷（B-H-07-02-00-07-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日〕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CAR），Ref.C04013582300（第 2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壹大日記，明治 32 年「壹大日記」（陸軍省-壹大日記-M32-3-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日〕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CAR），Ref.C06083559500（第 3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貳大日記，明治 35 年乾「貳大日記 3 月」（陸軍省-貳大日記-M35-3-1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東京：財團法人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

〔日〕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

〔日〕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

〔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東京：原書房，1975。

〔日〕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37：大本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7。

〔日〕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4 卷 1 號，1898 年 1 月 1 日，東京。

〔日〕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亜同文会史》資料篇。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報告》68-131 回，1905 年 7 月-1910 年 5 月。
〔日〕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陸軍部尚書廕昌氏〉，《東亞同文會支那調查報告書》1 卷 4 號，1910 年 8 月 15 日，東京。
〔日〕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支那》6 卷 1 號-9 卷 19 號，1915 年 1 月-1918 年 1 月。
〔日〕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第四回，1920 年 10 月 25 日，東京。

二、近人論著

尹雪曼，《軍學權輿——蔣百里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
牛俊法、張陸、王紹軍著，《百年中國史話：軍制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王彥民，《徐樹錚傳》。合肥：黃山書社出版，1993。
司馬桑敦，《張老帥與張少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石　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吳天任，《蔡松坡將軍年譜》。臺北：國立編譯館，1989。
吳相湘，〈評包維理著《中國新軍之興起》〉，收入氏著，《近代史事論叢》第一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吳相湘，〈李根源創立政學會〉，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三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吳相湘，〈「護國軍神」蔡松坡〉，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一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吳相湘，〈陳果夫久病成良相〉，收入氏著，《民國百人傳》第二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李　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8。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58。
李宗一，《袁世凱傳》。北京：中華書局，1980。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林德政，〈保定軍官學校之研究（1912-192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0。
季　宇，《段祺瑞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新華書店，1987。
查顯琳，《扶顛持危——陳英士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騰蛟，《使於四方——蔣作賓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
曹汝霖，〈兼長交通財政兩部的回憶〉，收入賈士毅著，《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郭榮生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陳崇橋、胡玉海、胡毓崢編著，《從草莽英雄到大元帥——張作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
惠德安，《張學良將軍戎幕見聞》。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項立嶺，《李烈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1898-1945）〉。東京：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日本文化研究專攻日本史學專門領域博士論文，2008。
趙宗頗、夏菊芳，《吳祿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劉志強、張學繼，《百年中國史話：留學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臺北：三民書局，1979。
劉鳳翰，《新建陸軍》。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蔣作賓，《蔣作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蔣復璁，〈先叔百里公年表〉，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六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鄭志廷、張秋山等編著，《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留学生史談》。東京：第一書房，1981。
〔日〕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日〕三浦裕史，《軍制講義案》。東京：信山社出版，1996。
〔日〕上法快男，《陸軍大学校》。東京：芙蓉書房，1973。
〔日〕大江志乃夫，《徵兵制》。東京：岩波書店，1981。
〔日〕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5。
〔日〕大濱徹也、小澤郁郎編，《帝國陸海軍事典》改訂版。東京：同成社，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小島晉治等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 100 年史》。東京：自由國民社，1976。
〔日〕小島慶三，《戊辰戦争から西南戦争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
〔日〕中村義、藤井昇三、久保田文次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
〔日〕井上光貞、永原慶二、兒玉幸多、大久保利謙編，《明治憲法体制の展開》上卷。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
〔日〕戸部良一，《日本の近代 9：逆説の軍隊》。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日〕田久川，〈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該校中國留學生〉，收入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編，《中日關係史論叢》第一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
〔日〕加藤陽子，《徴兵制と近代日本，1868-1945》。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日〕加藤陽子，〈陸軍中堅層の挫折：二・二六事件後の政治過程〉，收入氏著，《模索する一九三〇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
〔日〕古野直也，《天津軍司令部，1901-1937》。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
〔日〕吉川弘文館編輯部編，《近代史必携》。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
〔日〕寺田近雄，《日本軍隊用語集》。東京：立風書房，1997。
〔日〕竹山護夫，〈陸海軍中央機関の制度変遷〉，收入〔日〕平川祐弘、竹山護夫合著《古代中国から近代西洋へ》。東京：名著刊行會，2009。
〔日〕尾鍋輝彦，《帝国主義時代の開幕》。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日〕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68 復刻。
〔日〕東亞同文會編，《続対支回顧録》下卷。東京：原書房，1973 復刻。
〔日〕松下芳男，《日本軍閥興亡史》上卷。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1。
〔日〕武岡淳彦，《日本陸軍史百題——なぜ敗れたのか》。東京：亞紀書房，1995。
〔日〕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
〔日〕阿部洋監修，佐藤尚子、蔭山雅博、一見真理子、橋本學編，《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京：日本圖書中心，2005。
〔日〕相原茂樹，〈近衛篤麿と支那保全論〉，收入〔日〕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
〔日〕原　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
〔日〕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東京：文京出版，2000。
〔日〕秦郁彦，《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日〕高橋典幸、山田邦明、保谷徹、一ノ瀬俊也，《日本軍事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
〔日〕渡邊龍策，《近代日中政治交涉史》。東京：雄山閣，1978。
〔日〕黒野耐，《参謀本部と陸軍大学校》。東京：講談社，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黑龍會，《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卷。東京：原書房，1966。
〔日〕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東京：日華學會，1939。
〔日〕稻葉稔，《大村益次郎　　軍事の天才といわれた男》。東京：PHP 研究所，1998。
〔日〕篠原昌人，《陸軍大将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
〔日〕藤原彰、今井清一、大江志乃夫、江草忠允編，《近代日本史の基礎知識》增補版。東京：有斐閣，19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9 (June 2012), pp. 1-64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s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Focusing on Graduates from the First to Eleventh Terms

Yang, Tien-kun*

Abstract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graduate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research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and in research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istory of foreign affairs. That is because, of the four major sources to educate China's military talent, the earliest to be established was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 system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The teachers appointed to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schools of the late Q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Baoding Military Academy, as well as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which was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more or less relied on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suppli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The gradual participation of these overseas students on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military education made a considerably large contribution to the lasting operation of China's military education, as well as developing independent national survival.

Thes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passed through and completed preparatory military education at Seijou Preparatory School or Sinbu Preparatory School, as well as the formal military education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After they returned home, it can be said they brought about a deep and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military. Regardless whether it i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staff to the dualism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command, o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tumnal Field Maneuvers, a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tkya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ll as in the operations of each level of military school, we can se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Power, Yuan Shikai (袁世凱, 1859-1916), Duan Qirui (段祺瑞, 1865-1936), and Zhang Zuolin (張作霖, 1875-1928)in attracting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and placing them into important positions, aside from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benefits, also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leaning of each overseas student.

Key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cademy, Chinese Military Overseas Students,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 Northern Conservative Power, 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Pow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